

清代考據學對日本古典文學研究 之影響研探

——以木村正辭《萬葉集文字辨證》為中心

金原泰介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前言

衆所皆知，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流已有長久的歷史。根據日本史書《古事記》所載，應神天皇之時代（5世紀初期），《論語》已傳至日本¹。這表示日本人很早就接觸到了儒家思想。此後，中國儒學對日本仍持續保有長久影響，日本接受了中國各時代的代表性儒學思想或學風。

清代中國的代表性學術，自然非考據學莫屬。已經有學者探討日本學術對清代考據學的接受情形，如中山久四郎、林慶彰等考察過清代考據學對江戶時代日本漢學有著不少影響²。連清吉則對江戶時代考據學家進行過研究³。町田三郎指出：到明治時代，東京大學哲學科教授島田重禮（1838-1898）將考據學導入到經學研究，其學風影響了京都大學教授狩野直喜（1868-1947）、東京大學教授服部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清代考據學對日本古典文學研究之影響——以木村正辭《萬葉集文字辨證》為中心」（MOST 103-2410-H-224 -014）之部分研究成果。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審閱指正，提供高見，謹此致謝。

¹ 西宮一民編：《古事記》（修訂版）（東京：株氏會社おうふう，2012年），頁155。

² 中山久四郎：〈考證學概說〉，收入福島甲子三編：《近世日本の儒學》（東京：岩波書店，1939年），頁701-729。林慶彰：〈明清時代中日經學研究的互動關係〉，《中國經學研究的新視野》（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117-147。

³ 連清吉：《日本江戶時代的考證學家及其學問》（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

宇之吉 (1867-1939) 等漢學家⁴。我們可以藉此窺見，有不少近代日本學者接受了清代考據學。但是，這方面的研究仍然不多，對於考據學的接受範圍與其情形等問題，可以說至今仍處於初步研究的階段。

有專家認為考據學對日本的影響不一定僅限於漢學領域，木村正辭的日本古典文學研究中也能看到其影響。

木村正辭，江戶時代文政十年 (1827) 生。他在明治時代，擔任史料編輯、文科大學（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等職，明治二十六年 (1893) 辭去官職，專心於著述，大正二年 (1913) 逝世⁵。木村以《萬葉集》研究而聞名，在該書研究史上占重要地位⁶。關於他的《萬葉集》研究，小島憲之云：

我國學習清朝的學問方法並受其影響，是明確的事實。……木村正辭博士的實證性歸納法也是其中一個表現。木村博士對《萬葉集》的研究態度見於《萬葉集》「三辨證」（按：指木村所著的三本書：《萬葉集文字辨證》、《萬葉集訓義辨證》、《萬葉集字音辨證》），……其根柢與清代訓詁學（考證學）的方法有密切關係。⁷

《萬葉集》是一部日本古代的和歌總集⁸，其主要部分的編輯大概完成於八世紀後半。在日本江戶時代 (1603-1867) 中葉，「國學（指日本古代研究）」興起，契沖 (1640-1701)、賀茂真淵 (1697-1769)、本居宣長 (1730-1801) 等學者以《萬葉

⁴ 參閱町田三郎：〈島田篁村の學問一斑〉，《明治の漢學者たち》（東京：研文出版，1998年），頁101。

⁵ 關於木村正辭的履歷，參閱佐佐木信綱：〈木村正辭先生小傳〉，《文と筆》（東京：廣文堂書店，1915年），頁62-65。昭和女子大學近代文學研究室：〈木村正辭〉，收入《近代文學研究叢書》第十三卷（東京：昭和女子大學光葉會，1959年），頁397-444。

⁶ 山田孝雄認為，木村的研究成就引致現代《萬葉集》研究的盛行。參閱山田孝雄：〈萬葉集の傳來と研究史の概略〉，《萬葉集と日本文藝》（東京：中央公論社，1956年），頁68-69。

⁷ 「わが國に於ても、清朝の學問の方法を學び、その影響を受けたことは明かな事實である。……木村正辭博士の實證的歸納的方法もその一つのあらはれである。木村博士の萬葉學に示した態度は、その著，所謂萬葉集三辨證にみられるが、……その根柢に清朝訓詁學（考證學）の方法が深く根ざしてゐる。」以下本論文的日文的漢譯引文，則皆係筆者所譯。小島憲之：《上代日本文學と中國文學——出典論を中心とする比較文學的考察——》中卷（東京：塙書房，1964年），頁740。

⁸ 日本歷史可以分為四個時代：古代、中世、近世、現代。本論文以日本歷史學的時代劃分為根據，將鎌倉幕府建立（12世紀末期）之前稱為「古代」。對於日本古代的判定下限，參閱安田元久：〈中世・時代の範圍〉，收入《國史大辭典》第九卷（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年），頁502-503。

集》為重要研究領域。直到現在，仍有許多學者對此書進行研究，《萬葉集》可說是日本古典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因此，若小島的論述為真，則清代學術對日本古典文學研究之貢獻也不小，可以補充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空白部分。但是，目前為止，沒有人將木村的著作與清代考據學著作相比較，具體地探討「木村的研究是否真的受到考據學之影響？」、「兩者之間是否有異同？」、「木村的學術背景為何？」等基本問題⁹。

根據如上問題意識，筆者擬以木村正辭《萬葉集文字辨證》為中心，來驗證日本古典《萬葉集》研究與清代考據學之間的具體影響情形。

二、《萬葉集文字辨證》的學術特色與其影響

為了論述方便，我們先考察《萬葉集文字辨證》的內容。此書雖然是木村正

⁹ 研究木村正辭相關的論文不多，其成果大概可分為三方面：藏書或讀書活動研究、《萬葉集》研究之定位或意義、其他。藏書等方面的成果如下：大沼宜規：〈木村正辭舊藏資料について——解説と目録——（上）、（中）、（下）〉，《東洋文庫書報》第35號（2004年3月），頁23-112、第36號（2005年3月），頁23-78、第37號（2006年3月），頁27-82；〈木村正辭舊藏本の考證と復元——大東急記念文庫藏「觀齋藏書目録」をてがかりとして——（上）、（下）〉，《かがみ》第37號（2006年3月），頁1-52、第38號（2008年3月），頁54-116；〈舊藏書の識語にみる木村正辭——書物をめぐる活動記録稿——〉，《東洋文庫書報》第40號（2009年3月），頁15-46。對於木村正辭的《萬葉集》研究之定位、意義，如下論文、專書中有進一步的考察。佐佐木信綱等主編：《校本萬葉集》新增補版（東京：岩波書店，1994年），第1冊，首卷，頁488-493、532-535。鴻巣隼雄：〈鹿持雅澄の萬葉集古義と木村正辭、近藤芳樹の萬葉學〉，收入《萬葉集大成》第二卷（文獻篇）（東京：平凡社，1953年），頁273-290。久松潛一：〈明治の國文學者——小中村清矩と木村正辭——〉，《日本學士院紀要》第26卷第3號（1968年11月），頁133-142。神田喜一郎：〈木村正辭《萬葉集三辨證》解題〉，《神田喜一郎全集》第八卷（京都：同朋舍，1987年），頁54-57。大沼宜規：〈明治前期における歴史考證とその淵源——「經濟有用の系譜」——〉，《季刊日本思想史》第67號（東京：ペリカン社，2005年12月），頁28-49。此外，河野賴人、上野修也寫了木村正辭相關論文。前者介紹木村正辭的《萬葉集》研究相關資料。後者介紹木村對《萬葉集》中「菴」字的考證。河野賴人：〈木村正辭の萬葉集研究——國立國會圖書館藏「萬葉集會讀記」の紹介〉，《北九州大學文學部紀要》開學30年記念號（1977年3月），頁47-110。上野修：〈『萬葉集』における「菴」字考——木村正辭『萬葉集文字辨證』を中心に——〉，《日本文學論集》第27號（2003年3月），頁1-8。除了神田喜一郎〈木村正辭《萬葉集三辨證》解題〉之外，如上研究成果都沒有談到木村的《萬葉集》研究與清代考據學的關係。神田雖然提及清代考據學之影響，但其說明過於簡單，讓人不知其具體影響如何。

辭的代表著作之一，但未曾有專論探討其學術特色以及影響。

對於自己的《萬葉集》研究過程，木村正辭云：

余立志爲《萬葉集》之注釋，乃嘉永六年(1853)二十七歲時。時自稱《萬葉集》專家者，多主文字改易。余慨其妄，有意矯正此弊，首作《萬葉集攷文》，記諸古本之異同，以此訂正文本，後作注釋，自此專意收集古本。幸多得善本。欲解《萬葉集》，不可不先研究字形，次研究音義。抑古代一字多形，又音訓有古音古訓。若僅憑當今普通字書，則難讀者甚多。但其多用唐以前音訓也。故余起意著《萬葉集文字辨證》、《萬葉集訓義辨證》、《萬葉集字音辨證》三書，遂於安政二年(1855)完稿。¹⁰

木村回顧他年輕時代的《萬葉集》研究，由於不滿當時學者隨意提倡改字的言論，他開始進行對《萬葉集》的校勘工作、蒐集古版本，更進一步研究漢字之形、音、義。值得注意的，在木村的三《辨證》中，我們看到不少校勘成就（如校本之間的異文、文字之正誤等）、以及對先人學說之批判。由此可見，木村的《萬葉集》研究與校勘學、對改字的批判之間有分不開的關係。

三《辨證》中，批判改字觀點最明顯的是《萬葉集文字辨證》（以下簡稱《文字辨證》）。在本書之自序，木村批判了著名學者，云：

凡文字有正字，有通字，有俗字，有省筆，有增筆，有古今之異。故有不常見之字雖可疑，詳考後反爲古字者。且有古籍中所見誤字，雖知其誤猶不改者，則應以此意解古書，而近世之人遇少見之字，則以其爲誤字而欲改正，此何爲耶？……動輒謂爲誤字，隨意改之，此非可及也。縣居翁（賀茂真淵）、鈴屋翁（本居宣長）以爲今本《萬葉集》多有誤，故應考

¹⁰ 「おのれ萬葉集の注釋をものせん事をおもひたちたるハ、いにし嘉永六年にして、余が二十七歳の時たり。當時世の萬葉家と稱する人だち、かの文字を改易する説多くして、いと妄りなるを慨み、この弊を改めん事をおもひ起し、第一に萬葉集攷文といふものを作り、諸古本どもの異同を書し、これによりて本文を訂正し、後に注釋をものせんとして、それより古本を集むる事を専らと勉たりしが、幸にして多くの善本を得たり。かくて萬葉集をよみ解んにハ、先文字の形、次に音訓の事を研究せざるべからず。抑文字の形ハ、古代ハ一字につき種々の形あり。又音訓も、古音あり、古訓あり。今の普通の字書にのみよりてハ、之よみがたきもの甚多し。但し唐以上の音訓を用ゐたるもの多ければなり。之によりてまづ萬葉集文字辨證・萬葉集訓義辨證・萬葉集字音辨證の三書を著さん事をおもひ立ち、遂に安政二年脱稿したり。」木村正辭：〈萬葉集古義存疑〉，《國學院雜誌》第6卷第5號（1900年5月），頁2-3。

其誤。今人多從此。¹¹

木村認為，漢字本來就有通字、俗字等異體字，我們不能輕易地將異體字當成錯字而易之。但是，當世學者卻任意提倡改字。在《文字辨證》中，木村主要根據異體字，尤其是俗字研究的角度來批判過去對於《萬葉集》的校勘¹²。據木村來看，首倡改字且有影響力的學者是賀茂真淵、本居宣長。

賀茂真淵、本居宣長皆是江戶時代著名「國學」學者，對《萬葉集》研究皆有傑出成就。但是，兩者對《萬葉集》的研究並不完美。首先，他們對俗字的研究有所不足。換言之，兩者幾乎沒有關注傳本中的俗字。據筆者查考，賀茂在其主要著作《萬葉考》¹³中只有一處說到俗字，云（【】內是指《萬葉集》本文）：

【人毛無國母有粳。】¹⁴有據《和名抄》所見之「粳」（和名字流志祢 [u ru shi ne]）而為疑者。然《字彙》云：「粳同航，俗『糠』字。」故

¹¹ 「凡文字に正字あり、通字あり、俗字あり、省畫あり、増畫あり、古今の異あり。されば常に見なれぬ字にて、いかにぞやおぼゆるもよくおもへばかへりて古字なるあり。またまたく誤りながら、おもひの外に古きものにみえたるなどは、誤りとは知つ、も、猶改むまじきもあり。か、れば古書をば此意をもて讀解くべきことなるを、近き世の人は、常に目なれぬ文字をば、ともすれば誤字なりとして、改めかふるはいかなる事にや。……や、もすればひがもじひがもじといひて、おのが心にまかせて、みだりに改めかふるはいといとあるまじきわざなり。おもふにこは縣居翁鈴屋翁などの、今の萬葉集はいと誤多きものなれば、其誤りを考ふる事をむねとすべしといはれたるによりて、今もさる人々のおおほかるなるべし。」木村正辭：〈序〉，《文字辨證》（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4年），頁1-2。

¹² 為了便於論述，說明本論文所謂「俗字」此詞的定義。《文字辨證》中，木村沒有說清楚「俗字」的定義為何。再說，本論文所提的其他日本、清朝學者也沒有具體的定義。因此，本論文所謂「俗字」不能有嚴密的內涵。張湧泉針對俗字的範圍云：「凡是區別於正字的異體字，都可以認為是俗字。俗字可以是簡化字，也可以是繁化字，可以是後起字，也可以是古體字。正俗的界限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見張湧泉：《漢語俗字研究》（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頁5。據張氏所言，正字之外的異體字都算是俗字。張氏對俗字的定義相當寬緩，適合於本論文。

¹³ 本書收入《賀茂真淵全集》第一—五卷（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77-1985年）。

¹⁴ 此句雖然用漢字，但不像中國古文。《萬葉集》的特點在於其書寫方式，其中詩歌大部分用漢字來表示日文古文的發音。「人毛無國」此句發音為「hito mo na ki kuni」，是意味著：「無人的國。」「母有粳」發音為「mo ara nuka」，是意味著：「我要有。」全句的意思是：「我要去無人國。」現在日本人寫文章、詩歌一般都用平假名、片假名等表音字，另外也用漢字。然而，《萬葉集》成立的時代還沒有平假名、片假名，其所收錄的詩歌需要以漢字來表示日文發音。因此，其文法、發音跟從日本古文的規矩，與中國古文大有不同。

「粳」亦可讀為「奴加(nu ka)」。¹⁵

賀茂認為，「粳」是「糠」的俗字。但他判斷俗字的根據很薄弱，只以明代字典《字彙》（梅膺祚撰）為主而已。《萬葉集玉の小琴》¹⁶是本居宣長《萬葉集》研究之代表著作。據筆者查考，該書中沒有任何涉及關於俗字的部分。值得注意的，其他著名學者對俗字研究的態度也是相當消極。《萬葉集》研究史上，契沖(1640-1701)可算是最重要人物之一。契沖也在其著作《萬葉代匠記》¹⁷中提到俗字，但據筆者統計，只有五處而已¹⁸。而且其考察內容很簡單，如：

「梶」，和國俗字也。¹⁹

契沖對《萬葉集》中的漢字云：

此集文字正俗不分，又有以今之字書無從考其意者。古字書佚者亦多，故不應妄議。²⁰

可見契沖早已了解《萬葉集》中有不少俗字，但他自覺缺少古字典等研究資料，因此，即使契沖對於考察俗字的態度相當慎重，其考證也不能精緻。《萬葉代匠記》對後世的影響力極大，賀茂、本居皆受其影響²¹。由此可推測，賀茂、本居也自覺研究材料不足，因此，幾乎沒有探討俗字。此外，木村云：「縣居翁、鈴屋翁之時，文字之學未開。」²²此看法也可說明賀茂、本居著作的俗字研究背景。

¹⁵ 「【人毛無國母有粳。】粳（和名字流志祿）と和名抄に見ゆるをもて疑ふ説もあれと、字彙に粳同抗俗糠字とあれば、粳も奴加と訓へし。」賀茂真淵撰，井上豊校訂：《萬葉考》，《賀茂真淵全集》第四卷，頁183。

¹⁶ 本書收入《本居宣長全集》第六卷（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

¹⁷ 本書收入《契沖全集》第一—七卷（東京：岩波書店，1973-1975年）。該書有兩種版本：「初稿本」、「精選本」。久松潛一認為，相形之下，「精選本」在文獻考證、校勘、解釋方面有進步（參閱佐佐木信綱等：《校本萬葉集》，第1冊，首卷，頁414-415）。因此，本論文主要檢核「精選本」中的俗字研究部分。

¹⁸ 參閱契沖撰，築島裕等校訂：《萬葉代匠記》，《契沖全集》第一卷，頁613；《契沖全集》第二卷，頁40、71；《契沖全集》第四卷，頁309；《契沖全集》第六卷，頁322。

¹⁹ 「梶ハ和國ノ俗字ナリ。」閱契沖撰，築島裕等校訂：《契沖全集》第一卷，頁613。

²⁰ 「此集ハ文字ノ正俗ヲ正サス、又今ノ字書ヲ以テ考ヘ見ルニ意得カタキ事アリ。失タル昔ノ字書モ多カルヘケレハ、妄リニ議スヘカラス。」同前註，頁162。

²¹ 關於契沖對賀茂真淵、本居宣長的影響，參閱村岡典嗣：〈思想家としての賀茂真淵と本居宣長〉，《增訂日本思想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頁201-207。

²² 「文字の學はしも、縣居翁鈴屋翁の頃には、いまだよくも開けざりし。」木村正辭：〈本書の用字中、隋唐以前の音訓及び六朝の時の俗字を用ゐたるもの、事〉，《萬葉集美夫君志》（東京：上原書店、光風館，1901-1911年），首卷，頁28

再者，賀茂、本居對《萬葉集》的校勘往往過於武斷。如久松潛一認為，賀茂遇到解釋困難的部分，就認為此是錯字並逕予改字²³。本居宣長也往往主張改字。大久保正認為，本居的學說比賀茂周到，但因多有改字而失去歌意²⁴。

木村正辭與過去學者不同，在校勘方面重視各傳本中的俗字，不妄改字。他在《文字辨證》中往往將《萬葉集》各傳本中的異體字與日本、中國的文字資料對照，以找出俗字²⁵。如《萬葉集》的某傳本有句：「立走叫袖振。」²⁶木村將「叫」字視為俗字，云：

「叫」為「叫」之俗體，故不用改字。《日本書紀》卷五云：「驚之叫啼。」同書卷六云：「叫哭而自死之。」皆用此體。按：《龍龕手鑑》云：「叫（喚也。）叫（俗。）」是也。²⁷

木村為何重視俗字研究？我們必須先了解日本古鈔本與俗字密切相關。江戶時代末期到明治時代，有些學者注意到鈔本中多用俗字。如：以《左氏會箋》聞名的竹添進一郎（1841～1917）云：「卷子中多用異字，……則皆齊梁間通行俗字。」²⁸木村正辭指出：若不知俗字，則讀古書多有不便²⁹。可說，當時有學者認為，如果要研究日本古典的話，必需有俗字方面的知識。再者，木村頗為重視

²³ 佐佐木信綱等主編：《校本萬葉集》，第1冊，首卷，頁442。

²⁴ 大久保正：《本居宣長の萬葉學》，收入《宣長・鈴屋關係資料集・研究篇四》（東京：クレス出版，2012年），頁105。

²⁵ 現代學者王曉平指出，《萬葉集》中有不少漢字，在字形上與敦煌俗字和六朝唐代的俗字字形相同。參閱王曉平：〈俗字通例研究在日本寫本考釋中的運用——以《萬葉集》漢詩文為例〉，《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頁45-51。值得注意的，此篇論文中所使用的其他俗字資料（《千祿字書》、《龍龕手鑑》、《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同樣受到木村重視。而且，木村也認為在《萬葉集》中能看到六朝的俗字。參閱木村正辭：〈凡例〉，《文字辨證》，頁2；〈本書の用字中、隋唐以前の音訓及び六朝の時の俗字を用ゐたるもの、事〉，《萬葉集美夫君志》，首卷，頁27。可見木村對於俗字的研究具有先驅性意義。

²⁶ 《萬葉和歌集》（安田十兵衛刊行，寬永20年[1643]刊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卷9〈詠水江浦島子一首并短歌〉，頁19a。以下本論文中《萬葉集》的引文以《萬葉和歌集》為底本。寬永二十年出刊的《萬葉和歌集》是江戶時代最通行的刊本，《萬葉集文字辨證》也以此為底本。參閱木村正辭：〈凡例〉，《文字辨證》，頁3。

²⁷ 「叫は叫の俗體なれば、もとのまゝにてよろし。日本書紀卷五に驚之叫啼、同卷六に、叫哭而自死之とあるも此體を用ゐたり。按に龍龕手鑑云、叫（喚也）叫（俗）とある是也。」木村正辭：《文字辨證》，卷下，頁2。

²⁸ 竹添進一郎：〈自序〉，《左氏會箋》（東京：明治講學會，1904年），頁5a。

²⁹ 木村正辭：〈皇國の古書にハ俗字を多く用ゐたる事〉，《櫛齋雜攷》（東京：光風館書店，1909年），卷2，頁8b。

鈔本研究。在江戶時代之前，《萬葉集》各傳本以鈔本流傳。《校本萬葉集》解說了《萬葉集》的六十六種傳本。其中刻本只有十五種，而且都是江戶時代刻版的³⁰。在《文字辨證》中，木村利用了《萬葉集》的十一種傳本，其中有七種鈔本³¹。木村親自檢核各傳本而寫了《萬葉集書目》與《萬葉集書目題要》這兩本書，其中簡介三十種以上刊本、鈔本以及其他註釋本所引校本³²。對於這兩本書，久松潛一評為：「劃時代的名著。」³³木村可說是日本《萬葉集》目錄學的創始者。木村透過對古鈔本的檢核，應已親自了解到俗字研究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木村的俗字研究與對前人改字的批判應有密切關係。他在《文字辨證》中有六十二處對先人校勘提出修正，其中三十處與俗字相關。如《萬葉集》中能看到「我定義之」³⁴、「結義之玉緒」³⁵等具有「義之」的句子。本居宣長將其「義」字視為「義」的錯字³⁶。對此，木村云：

按：「義」俗作「義」，此俗體原已為人所用，並非後人誤寫。諸本皆作「義」，無作「義」者。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卷二十二云：「義農（上許反，正作『義』。伏羲、神農是古帝號也。）」可洪所見經文，「義」作「義」。〔正辭按：正安二年（1300）鈔本《仲文章》亦云：「伏羲即位，鳳凰至，居於其庭。」〕又〈帝堯碑〉云：「令養牲犧。」漢〈白石神君碑〉云：「備其犧牲。」「犧」為「犧」之俗體也。故《龍龕手鑑》云：「犧（正）、犧（俗）、犧（正）、犧（俗）。」可知「義」俗作「義」。日本古書多作「義之」。可見於《日本見在書目錄》（小學家部）云：「《筆勢論》一卷（王義之撰）。《用筆陳圖碑》一卷（王義之）。」……故《萬葉集》「義之」非後世傳寫之誤也。改字不如存其舊色。³⁷

³⁰ 佐佐木信綱等主編：《校本萬葉集》，第1冊，首卷，頁71-238。

³¹ 參閱木村正辭：《文字辨證·凡例》，頁3。

³² 參閱木村正辭：《萬葉集書目》（東京：大八洲學會，1889年）；《萬葉集書目題要》（東京：大八洲學會，1888年）。

³³ 「一時期を劃すべき名著。」佐佐木信綱等主編：《校本萬葉集》，第1冊，首卷，頁485。

³⁴ 〈金明軍歌一首〉，《萬葉和歌集》，卷3，頁41a。

³⁵ 〈寄玉〉，同前註，卷7，頁31b。

³⁶ 本居宣長撰，大野晉、大久保正編集校訂：《萬葉集玉の小琴》，頁48-49。

³⁷ 「今按に、義を俗に義ともかければ、もとよりこの俗體を用ゐたるにて、後人の寫し誤りたるにはあるべからず。諸本皆義とありて、義とかける本はあることなし。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廿二に云：義農（上許反，正作義。伏羲、神農，是古帝號也）とあり、

可見，木村很會利用中日俗字資料以證實《萬葉集》傳本中的俗字之存在，以修正前人校勘。

對於校勘古書原則，木村云：

凡古書有古字，有奇字，有俗字，有假借字。盡改為今世通用文字，亦失古書面目也。況以異形、異音之字妄改原字，可謂害古書甚大。³⁸

木村反對妄改傳本中的字形，又云：

夫校訂古書，無論正字、錯字，必還撰者舊色。若任意妄改古書文字則太甚。應留心於此。³⁹

據他所言，即使原本有錯也不需要修改，從事校勘的人不能妄改字。

由以上段落內容可知，《文字辨證》的校勘以俗字研究為基礎，其重點在於保存《萬葉集》傳本或原本之原貌。值得注意的，我們在後世的《萬葉集》研究中往往能看到與木村相同的校勘態度。如《校本萬葉集》是集《萬葉集》各傳本異文之大成者，可說是《萬葉集》之校勘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獻。該書沒有更改底本的字形，並留意各傳本中出現的異體字與通用字⁴⁰。現在出版的《萬葉集》刊本中，鶴久、森山隆主編的《萬葉集》是最著名的版本之一。鶴久等在〈凡例〉說明如何處理字形，云：

可洪が見たりし經文には、義を義に作りし也〔正安二年鈔本の仲文章といふものにも、伏羲即位鳳凰至居於其庭とかけり。〕又帝堯碑に、令養牲犧、漢白石神君碑に、備其犧牲とあるも、犧は犧の俗體也。故に龍龕手鑑に、犧（正）犧（俗）犧（正）犧（俗）といへり。されば、義をも俗に義とかけりし事おして知ルべし。かくて此土のものには、多く義之とのみかけり。其は日本見在書目録（小學家部）に、筆勢論一卷（王羲之撰）、用筆陳圖碑一卷（王羲之）と見え、……かかれば本書なるも後世傳寫の誤にはあらざるなり。これを改めむよりはもとのまゝにて舊色を存するこそよからめ。」木村正辭：《文字辨證》，卷上，頁27-28。

³⁸ 「凡古書には、古字あり、奇字あり、俗字あり、借字あり。是を盡く今世通用の文字に改るは、亦古書の面目を失するもの也。況や異字異音の字を以て、妄に原字を改易するが如は、古書を害する事甚大なりと謂ふべし。」木村正辭：〈文字を妄に改むまじき事〉，《萬葉集美夫君志》，首卷，頁32。

³⁹ 「抑、書籍を校訂するは、其書をしてよきもあしくも撰者の舊色にかへすを要とする事なり。しかるを己が意に任せて、古書の文字を妄りに改メ易ふるは、いみじきひがことなり。心すべし。」木村正辭：〈皇國の古書には俗字を多く用ゐたる事〉，《櫛齋雜攷》，卷2，頁10a-b。

⁴⁰ 參閱佐佐木信綱等主編：《校本萬葉集》，第1冊，首卷，頁23-24。該書直接複印的底本是寬永二十年刊《萬葉集和歌集》。可說《校本萬葉集》沒有更改底本的字形。此外，《校本萬葉集》列舉各傳本中出現的異體字、通用字（首卷，頁41-70）。

本文字形原則上從底本（西本願寺本）。但由於印刷等原因，亦有改動異體字、慣用字、略體字之情形。⁴¹

鶴久等盡量保留底本字形的校勘態度與木村相同。另外，佐竹昭廣云：

近代《萬葉集》研究中，不認同誤字說的禁慾主義成為學界主流。若提出某字是錯字，一定會引起研究者的反感與質疑。⁴²

近代《萬葉集》的研究，學界討厭改字。這也與木村正辭學風相似。

對於木村正辭《萬葉集》研究的影響，佐佐木信綱(1872-1963)的評價頗值得關注。佐佐木不僅是《校本萬葉集》的主編兼編輯代表人，而且在研究方面也頗有成就，算是近現代《萬葉集》研究史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佐佐木演講《萬葉集》研究歷史時，談到木村的研究成就，云：

最後，我要談一談木村正辭博士之業績：他在江戶時代末期彙整了《萬葉集》的相關文獻，在明治時代使《萬葉集》研究普及化，在校勘方面有所卓見。⁴³

可見木村正辭對後世《萬葉集》研究大有影響，其校勘研究受到高度評價。後世對《萬葉集》的校勘態度往往與木村的學風相似，其實並不足為奇。

經過如上檢討，我們可以歸納出《文字辨證》的特點以及其影響：

- (1) 與賀茂真淵、本居宣長等國學大師相比，木村正辭重視俗字研究。
- (2) 木村以俗字研究成果為基礎而修正過去國學對《萬葉集》的校勘。他主張：校勘需要保留原貌，反對妄改字，俗字不需修改。其校勘態度影響到後世《萬葉集》的校勘。

⁴¹ 「本文の字體は底本に従うことを原則としたが、印刷その他の事情で異體字・慣用字・略體字などを改めたものがある。」鶴久、森山隆編：〈凡例〉，《萬葉集》（東京：株式會社おうふう，2012年），頁1。

⁴² 「近代の萬葉學は、誤字説を認めない禁慾主義が主流を成しています。誤字説の提出は、必ず研究者の顰蹙を買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す。」佐竹昭廣：〈萬葉をよむころばへ〉，《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月報）》第90號（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頁15。

⁴³ 「最後に木村正辭博士の、幕末時代に於いて萬葉の文獻を集められたこと、明治時代に萬葉學を普及せられたこと、校勘學の上に卓説をのこされた事等に就いて述べたいのであります。」佐佐木信綱：〈萬葉學先哲の苦心に就いて〉，《教學叢書》第2輯（東京：教學局，1938年），頁52。

三、《文字辨證》與清代考據學之共同點

木村正辭在《文字辨證》中所引的清代考據學家總共六位：顧炎武 (1613-1682)、盧文弨 (1717-1795)、畢沅 (1730-1797)、段玉裁 (1735-1815)、王念孫 (1744-1832)、阮元 (1764-1849)。其所引書名及參考次數如下（括號中的數字表示次數）：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5)⁴⁴。

盧文弨：《羣書拾補·說苑》(1)⁴⁵。

畢沅：《經典文字辨證書》(6)⁴⁶、《墨子校註》(1)⁴⁷、《中州金石記》(1)⁴⁸。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以下簡稱《段注》）(5)⁴⁹。

王念孫：《廣雅疏證》(1)⁵⁰。

阮元主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以下簡稱《校勘記》）(2)⁵¹。

如上書單呈現出木村特別關注乾嘉考據學。

以下，我們先探討上述學者與木村之間的學術共同點。要留意的，若只是關注引文的話，我們可能沒法發現兩者的關聯性與異同。因為大部分的引文很短，而且這些引文的內容與俗字研究看起來不一定有關聯。但是，若擴大查考範圍，如檢核他們著作中的引文之外的部分，便能發現兩者的異同。

⁴⁴ 木村正辭：《文字辨證》，卷上，頁 48（2 處）。卷下，頁 21、22、47。

⁴⁵ 同前註，卷下，頁 51。

⁴⁶ 同前註，卷上，頁 6、36、39、47、60。卷下，頁 4。

⁴⁷ 同前註，卷下，頁 17。

⁴⁸ 同前註，卷上，頁 36。

⁴⁹ 同前註，卷上，頁 6、56。卷下，頁 7（2 處）、63。

⁵⁰ 同前註，卷上，頁 40。

⁵¹ 同前註，卷上，頁 51。卷下，頁 58。《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編寫過程很複雜，雖然一般認為該書是阮元著作，但是其實是以段玉裁為總纂、由七名學者（徐養原、嚴杰、顧廣圻、臧庸、李銳、洪震煊、孫同元）分校的共同著作。阮元、段玉裁、分校者的參與程度不清楚，學界現在仍在討論其具體編纂實況。因此，筆者在這篇論文中將阮元看做主編者。對於《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編寫相關問題，參考水上雅晴：〈顧廣圻與《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以《毛詩釋文校勘記》為考察中心〉，收入劉玉才、水上雅晴主編：《經典與校勘論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242-248。

(一) 反對妄改字

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刻成於嘉慶二十一年(1815)。他說明其校勘方針，云：

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于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據，慎之至也。⁵²

他認為，宋本中即使有錯字也不須改字，只須加上圈點以顯示誤處，並另附《校勘記》。引文呈現阮元對改字採取慎重態度⁵³。如前所述，木村正辭在校勘上重視保存原貌，反對妄加改字，認為：即使原本有錯誤，也不需要改字。其看法與阮元極為相似。木村在《文字辨證·凡例》說明該書的校勘原則，云：

古書皆常有異文，……彼此並存以傳後世，方為校勘古書之法。陸德明《經典釋文》，悉舉經傳文字之異同，讀近世清代阮元《校勘記》，亦可知其意。然仍有不解此意，以孤證刪削者，成無謂之損。況以臆見無據而改字耶？⁵⁴

可見木村認為《文字辨證》的校勘原則與《校勘記》相同。再者，《文字辨證》與《校勘記》的校勘格式也幾乎相同。如木村列舉《萬葉集》各傳本的異文，云（【】內係底本文句）：

【白雲母伊去波代加利。】代（官本、家本、昌本、活本及《仙覺抄》同。溫本、類本、拾本作「伐」。）⁵⁵

他又指出錯字，但無改底本字：

⁵² [清]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學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下冊，《三集》，卷2，頁620。

⁵³ 阮元雖然提出「不使輕改」、「加圈于誤字之旁」的校勘原則，但有學者指出：他所出版的《十三經注疏》實際上有許多改字的地方。參閱汪紹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文史》第3輯（1963年10月），頁33-35。郎文行：〈阮刻本《禮記注疏》底本改字初探〉，《文教資料》2013年第29期，頁51-53。

⁵⁴ 「すべて古書は、此と彼と文字の異あるは常のことにて、……さるたぐひはこれもかれも共に存して、後來に傳へむこそ古書を校合する法則にはあるなれ。陸徳明が經典釋文に經傳の文字の異同を悉くあげ、近くは清の阮元が校勘記を見ても其意をさとりべし。さるをこれらのことをばよくも心得ずして、一かたにつきて刪削をなすは、なかなかなるものそこなひぞおほかりける。まして據も無くして臆斷をもて改めかふるをや。」木村正辭：《文字辨證·凡例》，頁1-2。

⁵⁵ 同前註，卷上，頁21。

【嗚呼見乃浦。】各本同。「見」宜改作「兒」。⁵⁶

《校勘記》的校勘格式如下（【】內係底本文句）：

【注以四鎮之山爲綵飾。】惠棟按宋本，「綵」作「瑑」。閩、監、毛本作「琢」。案作「綵」，非也。作「琢」亦誤，當作「瑑」。⁵⁷

兩者皆列舉各版本的異文而無改底本字。可見木村其實將《校勘記》視爲對《萬葉集》校勘之榜樣，不妄改字。

除了阮元之外，《文字辨證》所引的王念孫、段玉裁、盧文弨皆是乾嘉校勘學名家。其中，盧文弨的校書也有「不妄改字」的原則⁵⁸。值得注意的是，「不妄改字」不是阮元、盧文弨的創見。顧炎武也有類似看法。木村正辭有一篇論文：〈古書を訂正する方法を論ず〉（論日本古典校勘法）。其中，木村批判日本學者的校勘態度，贊同顧炎武的校勘論：

近世之人校勘古書，多收集異本比較之，考彼此異同，合己意則是之，不合己意則非之，忽爾改易古書文字，草率之甚也。雖己思爲非，人見之時，反以原本爲宜者亦有之。故應盡量保持原本之貌，以注文記己所私爲宜者也。清朝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云：

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鉏」，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作「佩」。「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讐勘，豈不爲大害乎！

此論可採。⁵⁹

⁵⁶ 同前註，卷下，頁63。

⁵⁷ 阮元主編：《禮記注疏校勘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81冊，影印清嘉慶阮氏文選樓刻本），卷4，頁2a（總頁583）。

⁵⁸ 張舜徽：《廣校讎略》，《廣校讎略·漢書藝文志通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76。

⁵⁹ 「又近世の人の書を校正するには、多く異本を集めて之れを比較して、此と彼との異同を攷へ、己が意によろしと思へるものを是とし、己の意に適せざるものを非として、忽に古書の文字を改易する事なるが、此は甚だ卒忽なる事なり。おのれあしと思へる事も、人より之れを見る時は、却て、元の方宜しとする事間、あることなれば、なるべく本文は元のまゝにておき、己が思ふよきは注文中に記しておくべきなり。清の顧炎武が日知錄卷十八云：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鉏，乃環堵之誤。注

由上述可見，木村正辭特別關注清代校勘學，其校勘原則受到清代校勘學的影響。

(二) 以《說文解字》、《玉篇》、《廣韻》做為俗字資料

木村正辭所參考的考據學著作中，經常有講解俗字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所用的俗字資料頗多相同。

1. 以《說文解字》為文字規範

如畢沅在《經典文字辨證書》一書考察了經書中之漢字屬性，將漢字分為五類：正、省、通、別、俗。畢沅云：

作是書有五例。一曰正，皆《說文解字》所有者也。二曰省，筆蹟稍省于《說文解字》。……三曰通，變易其方而不鑿于《說文解字》。……四曰別，經典之字，為《說文解字》所無者也。……五曰俗，流俗所用，不本前聞，或乖聲義，鄉壁虛造不可知者，是也。⁶⁰

畢沅基本上以《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為文字規範，來判斷文字之正、俗等屬性。

段玉裁對俗字的判斷標準有三：《說文》不收入的字、形意不相一的字、一部分假借字⁶¹。段玉裁認為，《說文》是文字規範，用以判斷文字的正俗。

《校勘記》對俗字的判斷依據也與《說文》有關。《校勘記》云：

【以佐王建保邦國。】按依《說文》「左」者正字，「佐」者今俗字。⁶²
《校勘記》認為收入於《說文》的「左」屬於正字，未收入的「佐」是俗字。可見《校勘記》將《說文》當做俗字的判斷標準之一。

云：緒疑作佩。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讐勘，豈不為大害乎。この論を見るべし。」木村正辭：〈古書を訂正する方法を論ず〉，《東京學士會院雜誌》第15編之1（1893年1月），頁27-28。

⁶⁰ [清]畢沅：〈經典文字辨證書敘〉，《經典文字辨證書》（《續修四庫全書》第239冊，影印清乾隆刻《經訓堂叢書》本），頁1a（總頁468）。

⁶¹ 參閱李占平：《段注俗字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0年），〈概述〉，頁2。

⁶² 阮元主編：《周禮注疏校勘記》（《續修四庫全書》第181冊，影印清嘉慶阮氏文選樓刻本），卷5，頁5b（總頁170）。

木村正辭也據《說文》來判斷俗字，云：

「州」為正字，「洲」為俗字也。《說文》無「洲」字。⁶³

可言木村與清代考據學家相同，將《說文》視為文字規範。換言之，《說文》所收字為正字。

2. 《玉篇》、《廣韻》

《金石文字記》、《經典文字辨證書》、《墨子校註》、《段注》、《廣雅疏證》、《校勘記》引用《玉篇》、《廣韻》以做為俗字資料。如：

(1) 置(正。)寘(別。)寘、𠄎(並俗。上出《廣雅》，下出⁶⁴《玉篇》。

本皆古文，傳寫譌舛，難以定偏旁矣。《玉篇》字在〈収部〉。) ⁶⁵

(2) 【狗彘豚雞食其宀。】：「肉」字異文。《廣韻》云：「肉俗作宀。」⁶⁶

木村也以《玉篇》、《廣韻》做為俗字資料，如：

《萬葉集略解》改「啖」為「咲」。案：《玉篇》云：「啖(思曜切。俗『笑』字。)」《廣韻》云：「笑(欣也。喜也。亦作『笑』。私妙切。)啖(俗。)」然今更加一劃以為「啖」。《真本新撰字鏡》云：「『啖』、『啖』、『咲』(三字同。秘妙、於交，二反。喜也。□也。⁶⁷)」故「啖」亦可作「啖」(反切「秘」字為「悉」，「於」字為

⁶³ 「州は正字洲は俗字なり。洲字は説文になし。」木村正辭：《文字辨證》，卷下，頁33-34。

⁶⁴ 原文誤作「上出」。

⁶⁵ 畢沅：《經典文字辨證書》，卷3，頁8b(總頁495)。此外，《段注》、《校勘記》也以《玉篇》做為俗字資料。參閱〔清〕段玉裁撰，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2篇下，「𠄎」字條，頁136上。阮元主編：《儀禮注疏校勘記》(《續修四庫全書》第181冊，影印清嘉慶阮氏文選樓刻本)，卷11，頁31a(總頁447)。

⁶⁶ 〔周〕墨翟撰，畢沅校註：《墨子》(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卷15〈迎敵祠〉，頁184(總頁412)。此外，《金石文字記》、《段注》、《廣雅疏證》、《校勘記》也以《廣韻》做為俗字資料。參閱〔清〕顧炎武撰，徐德明校點：《金石文字記》，《顧炎武全集·建康古今記(外八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2，頁274。段玉裁撰，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第8篇下，頁707上，「𠄎」字條。〔清〕王念孫：《廣雅疏證》(《續修四庫全書》第191冊，影印清嘉慶元年[1796]刻本)，卷3上，頁11a(總頁78)。阮元主編：《周禮注疏校勘記》，卷10，頁2a(總頁239)。

⁶⁷ 「□」字表示印刷不清的地方。

「私」之誤也。) , 故「啖」本非誤字。⁶⁸

如上所舉的《說文》、《玉篇》、《廣韻》等書皆是清代學者所重視的考證資料。比如清代盛行《說文》研究，除了段玉裁之外，桂馥(1736-1805)、王筠(1784-1854)等不少學者寫了其注釋書。清代學者稱引《廣韻》的記載，視爲是漢晉以來的舊說⁶⁹。《玉篇》也爲清人所關注，被當做「補充與校正《說文解字》及諸書音讀的重要資料」⁷⁰。再者，衆所周知，古音屬於清代考據學的重要研究領域。在音韻研究上，《廣韻》等韻書，《玉篇》中的反切，《說文》中的諧聲字皆是重要資料⁷¹。可說清代學者根據自己常用的考據資料來判斷俗字。木村正辭在《文字辨證》中利用不少中國資料以研究文字。其中，被利用十次以上的資料如下(括號中的數字表示被參考次數)：

《說文》(19)、《龍龕手鑑》(19)、《玉篇》(18)、《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16)、《千祿字書》(15)、《廣韻》(11)

明顯地看到木村也重視《說文》、《玉篇》、《廣韻》等書。這也暗示《文字辨證》與清代考據學的密切關係。

由上述可知，《文字辨證》與清代考據學在俗字資料方面有共同點。此共同點代表何意義？木村指出過去《萬葉集》校勘的缺點，云：

《萬葉集》多誤字之說，乃前賢之時，文字之學未開，考證不精故也。縱於中國，文字學於宋以來亦甚粗略，然自清代乾隆時，復古之學興盛，文字學亦趨精細。⁷²

⁶⁸ 「略解に、啖に改めたり。案に玉篇に、啖(思暉切，俗笑字)、廣韻に、笑(欣也。喜也。亦作笑。私妙切)啖(俗)と見えたる、即ち是なり。但し今啖とあるは、更に一畫を増したるものにて、《真本新撰字鏡》に、啖、啖、啖(三字同。私妙、於交，二反。喜也。□也)と見えたれば、啖をまた啖ともかけるなり(反切の秘字は悉、於字は私字の誤りなり。)さればもとより誤字にはあらず。」木村正辭：《文字辨證》，卷上，頁52。

⁶⁹ 參閱趙少咸著，余行達等整理：《廣韻和廣韻疏證》，《廣韻疏證》(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頁4。

⁷⁰ 胡吉宣：《出版說明》，《玉篇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頁，頁2。

⁷¹ 參閱麥耘：《音韻學概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29-35。

⁷² 「萬葉は文字の誤多しとの説は、彼大人だちの頃には、いまだ文字の學問開けざりしほどにて、其考證の精しからざりしが故なり。文字の學問は支那にても宋以來甚鹿略なりしを、清の乾隆頃より復古學盛に興りて、文字の學問も精細になりし也。」木村正辭：《萬葉集總釋》(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5年)，頁39。

木村認為《萬葉集》研究需要「文字之學」，此學問在清代乾隆時期之後特別發達。可見，木村意圖將乾嘉考據學的成就應用在《萬葉集》校勘。如上資料方面的共同性，確實呈現出清代小學對《文字辨證》的影響。

四、《文字辨證》與清代考據學之差異

清代學者與木村正辭雖然在研究方面有所共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兩者的俗字觀卻有不同：木村主張俗字不需修改，清朝學者反而認為俗字需要訂正。

1. 盧文弨

盧文弨《羣書拾補·說苑》中有三條與俗字相關部分：

(1)【豎刀】「刁」，俗。宋、元本皆作「刀」。⁷³

(2)【王曰弟】「第」字，俗。⁷⁴

(3)【於是楊幹麻筋】「筋」俗字，當作「筋」。⁷⁵

括號內的文字原書是大字，係盧文弨校正的《說苑》之文。括號之後原書用小字，係盧氏之校注。關於《說苑》之校注，盧文弨云：「吾鄉孫侍御詒穀有校訂《新序》、《說苑》本，甚精細。今取之以校程榮本，正字大書，注其訛字於下。」⁷⁶由此可知，盧文弨將上文(1)、(2)中的俗字「刁」、「第」皆視為錯字，並予訂正。

2. 畢沅

畢沅在《釋名疏證》中判斷文字之正俗，有時將俗字改為正字⁷⁷。如《釋名·釋天》今本云：「其氣布散皓皓也。」畢沅卻將「皓皓」改為「顛顛」，

⁷³ [清]盧文弨：《羣書拾補》（《續修四庫全書》第1149冊，影印清《抱經堂叢書》本），說苑頁9a（總頁414）。

⁷⁴ 同前註，說苑頁19b（總頁419）。

⁷⁵ 同前註，說苑頁24a（總頁421）。

⁷⁶ 同前註，說苑頁1a（總頁410）。

⁷⁷ 《釋名疏證》中有一〇四處提到俗字。其中在二十一處將俗字改為正字。參閱魏字文：〈談畢沅《釋名疏證》中的「今本俗字」〉，《中國語文》2007年第1期，頁63。木村正辭在《萬葉集訓義辨證》中引用一次《釋名疏證》。木村正辭：《萬葉集訓義辨證》（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4年），卷上，頁92-93。

云：

「顛」今本作「皓」，俗字也。《說文》曰：「顛，白兒，从頁景。」

《楚詞》曰：「天白顛顛。」據此當作「顛」。⁷⁸

在《經典文字辨證書》中，「顛」被判斷為正字，「皓」是俗字⁷⁹。可見畢沅將正字、俗字的判斷標準應用於古書之校勘。對畢沅來說，《說文》是文字的標準，俗字就等同於誤字。

3. 段玉裁

《段注》中有六七二條與修正俗字相關部分⁸⁰。其中，段玉裁偶爾提到《說文》版本中的俗字，如：

(1)【佻，愉也。】古本皆作「愉」。汲古閣作「愉」，誤也。……「愉」者「愉」之俗字。⁸¹

(2)【从王，𠄎聲。】……而从𠄎之字，俗多改為从卯，自漢已然。……凡俗字𠄎變卯者，今皆更定。學者勿持漢人繆字以疑之。⁸²

可見段玉裁將俗字視為錯字而改為正字。

4. 王念孫

《廣雅疏證》云：

【蕪、菱、薄、荒、瑕，葦也。】「菱」者，《玉篇》：音亾泛切，草木蕪蔓也。《集韻》又：亾咸切。「菱」字從艸，菱聲。菱音，亾范反。各本作「菱」，俗字也。《廣韻》：「菱」，俗作「菱」。⁸³

王念孫認為「菱」俗作「菱」字。值得注意的是，王氏云：「各本作『菱』。」《廣雅疏證》中所謂「各本」包括底本（隋曹憲所傳本）⁸⁴。因此，我們知道王

⁷⁸ 畢沅：《釋名疏證》（《續修四庫全書》第189冊，影印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畢氏靈巖山館刻《經訓堂叢書》本），卷1，頁1a-b（總頁582）。

⁷⁹ 畢沅：《經典文字辨證書》，卷3，頁16b（總頁499）。

⁸⁰ 參閱郭在貽：〈《說文段注》與漢文字學研究〉，《郭在貽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331。

⁸¹ 段玉裁撰，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第8篇下，頁664上。

⁸² 同前註，第1篇上，頁31上。

⁸³ 王念孫：《廣雅疏證》，卷2下，頁8a（總頁62）。

⁸⁴ 關於《廣雅疏證》的底本、校本，參閱張其昀：《《廣雅疏證》導讀》（北京：社會科學

氏以底本的「菱」字改為「菱」字。可見王念孫將俗字視為錯字。

5. 阮元

對於版本中的俗字，《校勘記》云：

【亦名弩絃】陳本同。單疏本、雪牕本、注疏本，「絃」作「弦」。此從系旁者俗字，當訂正。⁸⁵

可見《校勘記》有時亦將俗字視為要訂正的錯字。

「俗字需要訂正」，此看法不僅見於考據學家的校勘工作。眾所周知，在乾隆時代，乾隆帝令學者編輯了大叢書《四庫全書》。其校正工作中也能看到類似的看法。《四庫全書》不是刊刻本，是鈔本。《四庫全書》所收的典籍一定需要經過謄錄繕寫底本、分校官校正繕寫本的過程⁸⁶。經過校正的鈔本，再需要軍機大臣、乾隆帝過目審查，每三月一次統計乾隆帝等發現的錯處，以做為處分的依據⁸⁷。由軍機大臣統計出來的記過單中，我們能看到俗字相關的記載，如：

(1) 「其誰有意於憐才」句，「憐」訛從俗體作「怜」。⁸⁸

(2) 「鹽鐵論」句，「鐵」字訛從俗寫作「鉄」。⁸⁹

(3) 《范德機詩集》內〈至夏莊懷平坡舊遊〉，「莊」字訛從俗寫作「庄」。⁹⁰

引文中雖然沒有表明，但皇帝等大概根據《康熙字典》或《說文》來判斷正俗。《康熙字典》云：「憐。……俗作『怜』。」⁹¹「鉄。……《正字通》：俗用爲『鐵』字，誤。」⁹²「莊。……俗作『庄』，非。」⁹³《康熙字典》所收字的字

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391。

⁸⁵ 阮元主編：《爾雅注疏校勘記》（《續修四庫全書》第183冊，影印清嘉慶阮氏文選樓刻本），卷中之下，頁6b（總頁389）。

⁸⁶ 關於《四庫全書》的繕錄工作，參閱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138-145。對於其校正工作，參閱同上書，頁145-150。此外，參考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00-108。

⁸⁷ 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頁103。

⁸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上冊，頁1186。

⁸⁹ 同前註，下冊，頁1339。

⁹⁰ 同前註，下冊，頁1471。

⁹¹ [清]張玉書等：《御定康熙字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9冊），卷10，頁62a-b（總頁442）。

⁹² 同前註（第231冊），卷31，頁12b（總頁323）。

⁹³ 同前註（第231冊），卷25，頁37b-38a（總頁20）。

形基本上以《說文》爲準⁹⁴，且引文中的俗字都沒有收入《說文》。可見《四庫全書》的校正工作也將《說文》所收字視爲文字規範。

除了皇帝、軍機大臣之外，《四庫全書》的總校官（校正方面之負責人）陸費墀（字丹叔，1731-1790）對俗字的看法也值得關注。陸氏爲了辨別俗字、正字、通字寫了一本書：《四庫全書辨正通俗文字》。其中所舉的俗字大部分被視爲「非」，如：「卯，干支名。俗作『𠂔』，非古死字。」⁹⁵「衡，从角，从大。俗从『魚』，非。」⁹⁶《四庫全書》分校官王朝梧（生卒年未詳）爲該書寫序，云：

閣學陸老前輩丹叔先生嚮有《四庫全書辨正通俗文字》之刻。蓋正者，斯字之本體也。通者，古今繁簡不同，凡隸省及前代碑搨，可從者也。俗者，承襲鄙俚，《後漢·儒林傳》所謂「別字」，今轉音謂之「白字」，斷不可從者也。恭繕館書者，倚爲司南。⁹⁷

陸費墀批評了繕寫本中使用俗字，而且《四庫全書》的謄錄將《四庫全書辨正通俗文字》視爲指南書。可見，《四庫全書》的繕寫、校正過程中，俗字被視爲錯字。

《四庫全書辨正通俗文字》的內容對後世具有一定影響。道光十三年(1833)，周景潢（生卒年未詳）回想參與科舉會試時以該書爲正字標準，云：「余自甲戌〔嘉慶十九年(1814)〕赴春闈，客留京邸者九年，每借正書灑於諸閣學暨鄉前輩，惟以陸〔陸費墀〕、王〔王朝梧〕兩先生《辨正通俗文字》爲準。」⁹⁸在道光朝，黃虎癡（生卒年未詳）寫了一本在晚清很有影響力的字書《字學舉隅》⁹⁹。

⁹⁴ 「六書之學，自篆籀、八分以來，變爲楷法，各體雜出，今古代異。今一以《說文》爲主，參以《正韻》，不悖古法，亦復便於楷書。」張玉書等：〈凡例〉，《御定康熙字典》（第229冊），頁1a（總頁4）。

⁹⁵ 〔清〕陸費墀：《四庫全書辨正通俗文字》（《續修四庫全書》第239冊，影印清乾隆刻本），頁8a（總頁535）。

⁹⁶ 同前註，頁13a（總頁537）。

⁹⁷ 同前註，〈序〉，頁1a（總頁531）。

⁹⁸ 此文見於〔清〕王筠：〈重槩正字略引言〉，《重槩正字略》（《續修四庫全書》第240冊，影印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大盛堂刻本），頁1a（總頁305）。

⁹⁹ 關於《字學舉隅》，參閱杉本つとむ：〈《字學舉隅》解說〉，《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別卷一（東京：雄山閣，1995年），頁412-415。孫雍長、李建國：〈宋元明清時期的漢字規範〉，《學術研究》2006年第4期，頁140-141。平田昌司認爲，乾隆中期或道光初期之後，清朝科舉殿試重視考卷的書體是否合於正楷。在此情況下，《字學舉隅》等文字參考書大量出版了。參閱平田昌司：〈科舉制度と中國語史〉，《古典學の再構

龍光甸（生卒年未詳）、朱琦（?-1861）在道光十八年（1838）、二十年（1840）為此書寫序，以《四庫全書辨正通俗文字》視為「近日通行」、「近世坊間所行」的書¹⁰⁰。據龍氏所言，黃氏認為：「《四庫全書辨正通俗文字》足為士林模楷。」¹⁰¹再說，黃氏也與《四庫全書辨正通俗文字》同樣地批評俗字，將「俗書」視為「鈔胥惡習」¹⁰²。

由上述可推測，乾隆朝到清末，「俗字需要訂正」此看法是常見的。《校勘記》云：

【鳳皇于飛】……閩本、明監本、毛本，「皇」作「風」，下同。案「風」俗字，不當用於經典。¹⁰³

此所謂「經典」雖然只指儒家經書，但是，這大概呈現當時校勘學界的一種共識：俗字不應該用於經典性著作。據吉川幸次郎所言，宋朝之後，以「俗」為字首的單詞——如「俗人」、「俗儒」、「俗本」等——一定會包含輕侮的意思¹⁰⁴。那麼，被視為「俗字」的字應當不適合用於經典。清代學者在經典性著作的校勘上要修改俗字，其實並不足為奇。

通過前節、本節的檢討，我們能了解到《文字辨證》與乾嘉考據學有如下共同點：

- (1) 不妄改字。
- (2) 以《說文》為文字規範，以《玉篇》、《廣韻》為俗字資料。

如上共同點顯示清代考據學對《文字辨證》的影響。但是，我們同時發現兩者之間有重要的差異點：乾嘉考據學家認為俗字需要訂正。此俗字觀的差異使得我們推測：木村正辭沒有無條件地接受清代考據學，其接受過程有另外因素影響到他的學術。

築》第7號（2000年7月），頁57-58，見《古典學の再構築》網址：<http://www.classics.jp/RCS/NL07/NL07Hira.pdf>。檢索日期：2016年9月1日。

¹⁰⁰ [清]黃虎癡撰，[清]龍啓瑞增輯，[清]張仲眉校：〈序〉，《字學舉隅》，《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別卷一，序頁1b（總頁301）、3a（總頁302）。

¹⁰¹ 同前註，序頁3a（總頁302）。

¹⁰² 〈摘誤〉，《字學舉隅》，同前註，摘誤頁1a-b（總頁328）。

¹⁰³ 阮元主編：《毛詩注疏校勘記》（《續修四庫全書》第181冊，影印清嘉慶阮氏文選樓刻本），卷6，頁45a（總頁23）。

¹⁰⁴ 吉川幸次郎：〈「俗」の歴史〉，《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二卷（東京：筑摩書房，1997年），頁245-246。

五、木村正辭的學術背景

對於木村正辭的學術背景，重野安繹（成齋，1827-1910）的看法值得關注，重野云：

本邦攷據之學，寬政(1789-1801)已降寢盛，而以椋齋狩谷氏爲稱首。木村君櫛齋受之岡本況齋翁，況齋翁受之椋齋氏。¹⁰⁵

據重野所言，木村繼承了岡本保孝（況齋，1797-1878）、狩谷望之（椋齋，1775-1835）的學統。岡本保孝，字子戒¹⁰⁶。岡本的研究領域廣泛，從中國經史子涉及佛典、日本古典文學。其著述豐富，據《慶長以來諸家著述目錄》來計算，總共有三七五種著作¹⁰⁷。狩谷望之，字卿雲，其著有《本朝度量權衡考》、《古京遺文》、《日本靈異記攷證》、《和名類聚抄箋註》等，在學術史上以對日本古文物、金石文、古書的考證、校勘聞名¹⁰⁸。

岡本、狩谷與木村確實在學術上有所共同或關聯。首先，狩谷與木村一樣，重視清代考據學的研究成就。他積極吸收清代考據學的新成果，如阮元主編的《皇清經解》在道光九年(1829)刻成，狩谷早在天保五年(1834)跟朋友共同訂購《皇清經解》¹⁰⁹。狩谷在其著作中常引《廣雅疏證》、《段注》、《釋名疏證》等清朝考據學著作¹¹⁰。此外，狩谷於文化十三年(1830)校勘《爾雅》時，除

¹⁰⁵ 重野安繹：〈櫛齋別集序〉，《成齋文二集》（東京：富山房，1911年），卷2，頁50a。

¹⁰⁶ 關於岡本保孝的傳記、學術，參閱榎一雄：〈岡本保孝のこと（上）、（下）、（補遺）〉，《東洋文庫書報》第8號（1977年3月），頁26-62、第9號（1978年3月），頁1-49、第10號（1979年3月），頁65-74。

¹⁰⁷ 參閱中根肅治《慶長以來諸家著述目錄·漢學家之部（上）》（東京：八尾書店，1894年），頁195-211。

¹⁰⁸ 關於狩谷的傳記、學術上的成就、定位，參閱梅谷文夫：《狩谷椋齋》（東京：吉川弘文館，1994年）。

¹⁰⁹ 松崎復云：「椋翁〔指狩谷望之〕來云、與森村·諸葛·澁江三生·鱗金買《皇清經解》。」松崎復：《謙堂日歷》（東京：鳳出版，1972年《日本藝林叢書》第11冊），天保五年十二月晦，頁764。

¹¹⁰ 參閱藏中進：〈『箋注倭名類聚抄』と清朝學術（その一）——『康熙字典』『佩文韻府』『駢字類編』をめぐって——〉，《東洋研究》第153號（2004年11月），頁1-25；〈『箋注倭名類聚抄』と清朝學術（その二）——王念孫『廣雅疏證』をめぐって——〉，《東洋研究》第157號（2005年11月），頁1-34；〈『箋注倭名類聚抄』と清朝學術（その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をめぐって——〉，《東洋研究》第161號（2006年11月），頁81-110；〈『箋注倭名類聚抄』と清朝學術（その四）——畢沅『釋名疏證』をめぐって——〉，《東洋研究》第165號（2007年11月），頁59-87。

了參考阮元主編的《爾雅注疏校勘記》之外，往往利用邵晉涵、戴震、盧文弨、段玉裁、孫星衍等清朝學者的學說¹¹¹。

狩谷的學風在當時頗有影響力。如市野光彥（迷庵，1765-1826）先信奉朱子學，後來受到狩谷望之之影響而將其學風轉變為考據學¹¹²。再說，同時代漢學家松崎復（謙堂，1771-1844）亦有類似經驗，受到狩谷之影響而開始學清代考據學¹¹³。

要之，狩谷是一個學者群體之領導者，其群體重視清代考據學，其成員市野光彥、松崎復等皆利用清代著作。其群體中有木村正辭的漢學老師岡本保孝。岡本保孝與狩谷有學術交流，他讚揚狩谷的學識¹¹⁴，有時將狩谷稱為「先生（老師）」¹¹⁵。

以下主要以俗字研究的共同點為主，探討木村與岡本、狩谷的學術關係。

（一）岡本保孝與木村正辭

岡本保孝研究俗字，與木村正辭同樣重視《說文》，以做為判斷俗字的依據。如對於「躡」字的正字、俗字，岡本云：

保孝謂：躡（正字。《說文》、《玉篇·足部》）。躡（《說文》：或體。《玉篇·尸部》，「屣」字注）。跣（以下三字，俗體也。《玉篇·足部》）。屣（《玉篇·尸部》。按「屣」是「屣」之誤耳）。跣（《玉篇·尸部》，「屣」字注）。此五字，正俗之異耳。¹¹⁶

可見將《說文》未收之字視為俗字。其他俗字資料也與木村一致，如岡本在考察「齋」字的俗字時，列舉《玉篇》、《廣韻》等資料¹¹⁷。

如前所述，清代考據學著作也引用《說文》、《玉篇》、《廣韻》以做為俗

藏中進主要檢討引書狀況，沒有仔細考察狩谷的學術與清代考據學之間有何異同。

¹¹¹ 藤山和子：〈江戸後期の考證學者と段玉裁の『說文解字注』〉，《大妻比較文化：大妻女子大學比較文化學部紀要》4（2003年3月），頁108。

¹¹² 參閱川瀨一馬：〈市野迷庵〉，《日本書誌學之研究》（東京：講談社，1971年），頁737-738。

¹¹³ 岡本保孝：《診癡符》（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鈔本），第21冊，第18條。

¹¹⁴ 參閱榎一雄：〈岡本保孝のこと（下）〉，頁21。

¹¹⁵ 岡本保孝在〈交友簿〉中將狩谷望之稱為「先生」。參閱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解題〉，《日本隨筆大成》新裝版（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年），第2期21冊，頁7。

¹¹⁶ 岡本保孝：《診癡符》，第12冊，第26條。

¹¹⁷ 同前註，第16冊，第20條。

字資料。其實岡本與木村同樣往往在其著作中利用乾嘉學者的研究成果，而且他們所參考的著作也多所雷同。如引《段注》、《廣雅疏證》、《校勘記》都引用自岡本的考證筆記《論癡符》¹¹⁸。再者，岡本注意到阮元《校勘記》的俗字相關記述。岡本寫了一本被稱為《古今文字》的書，其內容大部分引用《校勘記》中的通假字、俗字相關記載。如：

嚮、鄉、向、鄉。

按「嚮」，俗字。「鄉」者，今之「向」字。（《易》，三，一右。）○按「鄉」正字。「嚮」、「向」皆俗字。（《左氏》，四，一左。）按經傳鄉背字多作「鄉」，不作「向」。（《左氏》，六，八右。）¹¹⁹

原注部分的數字都表示《校勘記》的卷數、頁數。如「《易》，三，一右」是意指《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三，頁一右欄¹²⁰。《古今文字》共有三十九頁，可見岡本對《校勘記》的重視。除了《段注》、《廣雅疏證》、《校勘記》之外，岡本也參考盧文弨《羣書拾補》、畢沅《經典文字辨證書》等校勘、文字學著作¹²¹。

岡本保孝是木村正辭的漢學師。關於木村對清代考據學的接受，岡本一定會有大影響。木村回顧自己跟岡本就學的緣故，云：

余欲稍明漢字音韻與各類漢籍，乃告此事予伊能穎則老師¹²²。伊能老師云：「我於此學，並無把握足以教導他人。吾友岡本保孝先生方熟於此道。」其後伊能老師攜余訪岡本老師，告以余志。¹²³

¹¹⁸ 如岡本保孝：《論癡符》，第8冊，第18條（引《段注》）、同上書，第3冊，第16條（引《廣雅疏證》）、第22條（引《論語注疏校勘記》）。

¹¹⁹ 岡本保孝：《古今文字》，收入《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第八卷（東京：雄山閣，1995年，影印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鈔本），頁89。

¹²⁰ 岡本所參考的《校勘記》是文選樓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80-183冊。

¹²¹ 參閱岡本保孝：《論癡符》，第3冊，第29條（引《羣書拾補》）、第23冊，第19條（引《經典文字辨證書》）。

¹²² 伊能穎則(1805-1877)是木村的國學師。但據筆者查考，木村在其學術著作中沒有提到伊能的名字，而且伊能自己沒有寫出《萬葉集》相關著作。參閱中根肅治：《慶長以來諸家著述目錄·和學家之部》（東京：八尾書店，1894年），頁21。由此可推測，伊能對木村的《萬葉集》研究幾乎沒有影響。

¹²³ 「おのれかたは漢文字の音韻のこと、または彼國の何くれの書どものことを、おろおろとひあきらめまほしうおもひて、その事を申しに、大人のいへらく、われはさるかたのまなびは、むねとせしにもあらねば、人にをしふことはおぼつかなくなん、わがしり人に岡本保孝ぬしこそそのかたの學びにつきては隈なくおほしけれ、とてやがてわれをいざなひて岡本大人がり行て、吾こころざしのほどをはいひいれ給はりき。」木村正辭：〈祭伊能大人之靈辭〉，《櫛齋集》（東京：木村正辭個人出版，1911年），卷

引文呈現木村的漢學研究從漢字音韻學著手。木村所謂「漢字音韻」為何？木村對音韻學的了解見於他演講：〈音韻學の要領〉。此演講云：

余今日就漢字音韻述說管見，以聊備諸君參考。然今之中國語音並非所謂之唐音，乃古來傳至日本之漢吳音。……日本古書於平假名、片假名出現之前，如《古事記》、《日本書紀》中之歌，《萬葉集》卷十七以下或《古風土記》中之歌，皆用漢字音書寫。故不知漢字正音則不能讀歌。欲知上古人情風俗，不能不讀歌。故日本古書研究者必學漢字音韻法則。¹²⁴

木村認為，爲了研究日本古書而需要了解中國古音。此演講中，木村說到顧炎武、段玉裁、王念孫的音韻學研究成就¹²⁵。如前所述，木村贊同顧炎武的校勘原則，在《文字辨證》引用段玉裁與王念孫的小學著作。其實顧、段、王對古音研究也皆頗有成就。由此可推斷，木村一定會在岡本的指導之下，學習清初到乾嘉學者的重要音韻研究成就，以及音韻學之外的領域：校勘學、俗字研究等。職是之故，岡本保孝與其弟子木村正辭在其研究上，皆引用了同樣的清代著作，而且其俗字資料也頗多相同。

由上述可知，木村的俗字研究與清代考據學相關知識有部分來自於岡本保孝。雖然如此，相形之下，岡本與木村在學術上有所不同：岡本對俗字的校勘態度卻與清朝乾嘉學者相似。如《戰國策·秦策三》云：「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璞。」對於「璞」字，岡本云：

「璞」當作「樸」。……「樸」，正字。「璞」，俗字也。¹²⁶

可見岡本也認為俗字應該改爲正字。

那麼，木村對俗字的校勘態度來自於哪裏？我們接著探討木村與狩谷望之的學術關係。

下，頁43b。

¹²⁴ 「余は今日支那字の音韻の事に就て管見を述へて聊諸君の參攷に備へんとす。但し即今の支那音所謂唐音の事を云にあらざ。古來日本に傳はれる漢吳音の事を述ぶるなり。……日本の古書未だ草假字片假字の出來ざりし時には、古事記日本書紀の歌を始め、萬葉集卷十七以下又は古風土記の歌等は、すべて支那字の音を用ゐてかけるものなるから、其音を正す事を知らざれば讀解く事能はず。歌は上古の人情及び其世の風習を知らんには之に及ものなし。故に國書を研究せん人は必字音の法則を學ぶべきなり。」木村正辭：〈音韻學の要領〉，《東京學士會院雜誌》第18編之4（1896年4月），頁166。

¹²⁵ 同前註，頁174。

¹²⁶ 岡本保孝：《詮癡符》，第9冊，第25條。

(二) 狩谷望之與木村正辭

狩谷望之與木村正辭同樣著重研究日本古典中的俗字。狩谷的研究成就主要展現於《和名類聚抄箋註》（以下簡稱《箋註》）中的《異體字辨》¹²⁷。《箋註》是《和名類聚抄》的注釋書。《和名類聚抄》（又名《倭名類聚抄》、《和名抄》、《倭名抄》等）是源順(911-983)在十世紀編寫的辭典。狩谷將《異體字辨》附在《箋註》各卷末，根據異體字研究的觀點來考察各版本之異文¹²⁸。其中有不少對俗字的考證。據長澤規矩也說，狩谷校訂書多利用日本古鈔本¹²⁹。《箋註》所用的校本共有十二種，其中九種是鈔本¹³⁰。由此可推知，狩谷與木村相同，透過檢核古鈔本的經驗，親自了解到俗字研究的重要性。

對於《箋註》版本中的俗字，狩谷云：

- (1)【斲。】《那波本》，「斲樞」作「斲樞」。與《廣韻》合。按《龍龕手鑑》云：「『斲』正，『斲』俗。」源君（指源順）所引每變從俗寫。此作「斲樞」，蓋係那波氏所改。¹³¹
- (2)【虱。】《下總本》，「虱」作「蝨」，原書虫部合。《龍龕手鑑》云：「『蝨』正，『虱』俗。」蓋源君多從俗寫者。《下總本》作「蝨」，恐後人校改。¹³²

狩谷認為：《和名類聚抄》原本多以俗字寫成，有些傳本中的正字則是後人所改的結果。七世紀到江戶時代，日本古鈔本中的漢字受到唐初書體的影響，初唐字書《干祿字書》中的俗字、通字，算是在日本七世紀之後常見的字形¹³³。如上引

¹²⁷ 《和名類聚抄箋註》又名《箋注倭名類聚抄》。杉本つとむ根據狩谷望之的原稿而做判斷：正式書名是《和名類聚抄箋註》。杉本つとむ：〈『和名類聚抄箋註·異體字辨』解說〉，《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第十卷（東京：雄山閣，1995年），頁315-316。

¹²⁸ 杉本つとむ已經編輯稿本《異體字辨》而影印出版了。對於杉本影印的稿本，參閱〈『和名類聚抄箋註·異體字辨』解說〉，頁316-317。本論以杉本影印的《和名類聚抄箋註·異體字辨》，收入《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第十卷為底本。《和名類聚抄箋註·異體字辨》以下簡稱《異體字辨》。

¹²⁹ 長澤規矩也：〈日本書誌學史〉，《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四卷（東京：汲古書店，1983年），頁105。

¹³⁰ 狩谷望之：〈參訂諸本目錄〉，《箋注倭名類聚抄》（東京：曙社，1931年），卷1，頁3-4。

¹³¹ 狩谷望之：同前註，卷5，頁6a-b（總頁175-176）。

¹³² 同前註，卷8，頁8b（總頁208）。

¹³³ 石塚晴通：〈漢字字體の日本の標準〉，收入石塚晴通主編：《漢字字體史研究》（東京：勉誠出版，2012年），頁15-16。

文中雖然狩谷主要利用《龍龕手鑑》，其實他在《異體字辨》中往往用《干祿字書》來指出傳本中俗字。狩谷認為《和名類聚抄》的原本多用俗字，此看法其實符合歷史實況。再說，狩谷用古鈔本校勘日本古典《日本國現報善惡靈異記》，以寫其定本《校本日本靈異記》。其定本沒有更改校本中的俗字，狩谷自跋云：「如其字形一依二古本，古人筆蹟自有淵源，不可妄改也。」¹³⁴狩谷認為，日本人用俗字寫作，其歷史悠久，因而不能妄改古鈔本中的俗字。

對於日本古代用字情形與對古書中俗字的校勘，木村也有與狩谷類似的看法，云：

蓋於皇國正史中亦多見，《干祿字書》所謂俗字、通字。此等文字非皆為後世抄寫人所私改，必有不少作者原本所用之俗字。若現將其盡改為正字，反失其舊色，不可為之。究其原因，首先由傳至近世之金石字樣之調查可推斷，再者，〈學令〉云：「凡書學生，以寫書上中以上者，聽貢。」《義解》云：「謂定書品第，待式處分，其書生唯以筆迹巧秀為宗，不以習解字樣為業，與唐法異也。」可知我國自古以來，唯論書道字跡優劣，不甚關心字形正俗。¹³⁵

木村認為古代日本人對字形不太關心，舉出兩種證據。第一：日本金石文的用字情形。一般來說，金石文沒有受到後世刻本或鈔本那樣改字之影響，其中字形應當是刻金石文那時代通行之文字。因此，木村關注金石文頗為合理。木村也在《文字辨證》引用了七篇日本金石文來探討《萬葉集》傳本中的俗字、通字¹³⁶。

¹³⁴ 狩谷望之：《校本日本靈異記》，《狩谷椋齋全集》（東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25年），第1冊，頁252。

¹³⁵ 原文：「そもそも皇國にてハ、正史の中にすら字書にはゆる俗字通字などいふたぐひの文字の多くまじれるを、此等の文字どもすべて後に寫し傳ふる人、の私に書かれたるものなりとはおもはれず。かならず撰者のもとよりさる文字してかけるもおほかるべければ、今これをみながら正字に改めんハ、かへりて舊色を失するわざにて、さハすまじき事なるべし。そはいかにとなれば、まづ近世傳はれる金石の字様を見てもおほかたはおしはからるるを、學令云：凡書學生，以寫書上中以上者，聽貢。義解云：謂定書品第，待式處分，其書生唯以筆迹巧秀為宗，不以習解字樣為業，與唐法異也とありて，此方にてハ古より筆迹の優劣をのミ論じて、字形の正俗にハ、さのみかかはり給はざりしなり。」木村正辭：〈皇國の古書にハ俗字を多く用ゐたる事〉，《櫛齋雜攷》，卷2，頁8b-9b。〈學令〉、〈義解〉之原文見於清原夏野等：《令義解》，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普及版（東京：吉川弘文館，1994年），卷3，頁132。

¹³⁶ 參閱木村正辭：《文字辨證》，卷上，頁22。卷下，頁39、40、41、67、71。

值得注意的是，《文字辨證》所引的金石文皆收入狩谷望之撰《古京遺文》¹³⁷。《古京遺文》是一部主要研究奈良時代(710-794)金石文的考證著作。木村收藏了兩種《古京遺文》(鈔本、狩谷手寫本)，他在書上寫批注，做校勘¹³⁸。可見木村重視狩谷的金石學。《古京遺文》所收金石文中有不少異體字¹³⁹。狩谷云：「當其異體文字於西土古碑間有所見，則舉之，示雖俗訛字，亦有淵源。」¹⁴⁰狩谷將日本金石文視為俗字資料，而且他也認為，金石文是古代日本作文用俗字的重要證據。此看法與木村相同。

第二，木村以日本法律〈學令〉、《義解》做為證據。〈學令〉收入日本古代法律《養老令》(天平勝寶九年[757]施行)¹⁴¹。《義解》是《養老令》的公定註釋書，施行於承和元年(834)¹⁴²。《萬葉集》主要部分的編輯大概完成於八世紀後半。〈學令〉、《義解》的內容有可能反映出編輯《萬葉集》時期的用字情形。同時代的唐朝法典(成立於開元二十七年[739])《唐六典》就國子監的書學生之教學內容而云：

書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為生者，以《石經》、《說文》、《字林》為專業，餘字書亦兼習之。《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¹⁴³

相形之下，唐代學校的書學教育較重視《石經》、字典中的字形。奈良時代日本人的用字情形也證實木村的看法。奈良時代的《東大寺獻物帳》——此文獻代表當時日本書法的最高水準——多用初唐字書《干祿字書》的通體、俗體字¹⁴⁴。此外，奈良時代的佛經繕寫本與其校正工作也值得關注。繕寫本中雖然多有異體字，但是當時校正人員沒有將異體字視為錯字¹⁴⁵。

¹³⁷ 參閱狩谷望之撰，山田孝雄、香取秀真校訂：《古京遺文》，《狩谷椽齋全集》(東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28年)，第9冊，頁12、20、22、32、39、59、66。

¹³⁸ 參閱大沼宜規：〈木村正辭舊藏本の考證と復元——大東急計念文庫藏「櫛齋藏書目錄」をてがかりとして——(上)〉，頁72上。

¹³⁹ 參閱杉本つとむ：〈『和名類聚抄箋註・異體字辨』解説〉，頁429-430。

¹⁴⁰ 狩谷望之：《古京遺文·序》，頁1。

¹⁴¹ 參閱井上光貞等校注，《律令》(東京：岩波書店，1976年)，頁768。

¹⁴² 同前註，頁792。

¹⁴³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562。

¹⁴⁴ 鈴木一男：〈上代人の正字意識について〉，《國語と國文學》1968年11月號，頁8-9。

¹⁴⁵ 同前註，頁7。

要之，狩谷、木村的校勘基礎在於日本歷史中的文字使用情形。其對俗字的校勘方針可以概括為：古代日本人不在意漢字字形的正俗，古書作者可能原來用俗字書寫，若修改俗字，則是屬於損失古書原貌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木村正辭對狩谷《箋注》的評價。《箋注》在明治十六年(1883)首次出版於印刷局¹⁴⁶。木村早在萬延元年(1860)之前從岡本保孝借出《箋注》，自己做繕寫本¹⁴⁷。木村認為《異體字辨》是狩谷發揮其學力的重要研究成就¹⁴⁸。可見木村對《箋注》，尤其是其《異體字辨》具有高度評價。再說，木村讚揚狩谷對《日本國現報善惡靈異記》的校勘¹⁴⁹。木村對俗字的校勘方針應當受到狩谷之影響。

最後要談一個問題。狩谷望之、木村正辭在學術方面雖然受到清代考據學的影響，卻沒有繼承「俗字需要訂正」的俗字觀。他們的俗字觀為何與考據學不同？這可能與他們的研究理念有關。由於有關狩谷的研究理念方面的資料極少，因而以下以木村為中心來探討如上問題。

首先我們必須注意木村的研究領域與江戶時代的國學有所重疊。江戶時代的《萬葉集》研究，由木村正辭集大成¹⁵⁰。《萬葉集》當然是江戶時代國學的重要研究領域。再者，國學者重視研究古代語言，本居宣長遵從其師賀茂真淵的教導：「我師（指賀茂）常教云：『不知古言則不知古意，不知古意則難知古道。』此言似迂遠而實不然。」¹⁵¹其實木村的研究領域也與日本古代語言有關。木村為了瞭解日本古典的讀音而跟著岡本保孝研究音韻學，且自己在《萬葉集字音辨證》中探討《萬葉集》中漢字的古代發音，引用了賀茂真淵《萬葉考》、本居宣長《漢字三音考》、《古事記傳》、《玉勝間》等國學著作¹⁵²。

由此可言，木村的研究領域接近賀茂真淵、本居宣長的國學。以賀茂、本居

¹⁴⁶ 指一八八三年東京印刷局出版的《箋注倭名類聚抄》。

¹⁴⁷ 木村正辭：《萬葉集訓義辨證》，卷下，頁78。

¹⁴⁸ 木村正辭：〈日本古代字書の説〉，《東京學士會院雜誌》第19編之10（1897年11月），頁422-423。

¹⁴⁹ 木村正辭：〈古本靈異記〉，《櫛齋雜攷》，卷下，頁32a。

¹⁵⁰ 參閱佐佐木信綱等主編：《校本萬葉集》，第1冊，首卷，頁532-535。

¹⁵¹ 「古言をしらでは、古意はしられず、古意をしらでは、古の道は知がたかるべし、といふこゝろばへを、つねづねいひて、教へられたる、此教へ迂遠きやうなれども、然らず。」本居宣長撰，大野晉、大久保正校訂：《宇比山踏》，《本居宣長全集》第一卷（東京：筑摩書房，1968年），頁17。

¹⁵² 參閱木村正辭：〈總論〉，《萬葉集字音辨證》（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4年），頁1、3、5、7。

爲中心的國學有著明確的研究理念：學者在古代日本研究上不能有成見。如賀茂真淵批判後世人貿然參閱中國古籍以研究古代，云：

後世之人多誤以《萬葉集》爲歌，歌乃女性遊樂事，因而不讀古歌且不知古書，強據漢籍解神代之事。故此皆爲空談，盡不合吾皇國古道。¹⁵³

本居宣長記錄了賀茂的《古事記》（日本最古歷史書）研究法：

我（指賀茂）本志於解讀《古事記》。此必先清除「漢意（からごゝろ）」，以求古之真意。¹⁵⁴

根據賀茂的研究理念，「漢意」是在日本古代研究中需要被排除的成見。「漢意」亦爲本居所惡，他對學者根據「漢意」來研究的作法進行批判。此種「漢意」包含三種意義：(1) 中國思想、(2) 來自中國文化的價值判斷、(3) 合理主義¹⁵⁵。

此外，國學者對後世成見也有所批判。本居宣長對國學進行定義，云：「古學（指國學）皆無涉後世之說，凡事由古書考其本，以詳明日本古代之學問也。」¹⁵⁶本居提醒學者應當排除後世學說的成見。他認爲，古代、後世、中國此三者各有各的「意」、「事」、「言」，此三者的「意」、「事」、「言」在研究上應當分別來看，不能混同¹⁵⁷。

賀茂真淵、本居宣長的國學對木村正辭有一定的影響。木村雖然對賀茂、本居的《萬葉集》校勘有所批判，但是，他讚揚了此兩者對《萬葉集》研究之教訓（其中包含了上面所引的《初學萬葉梯》、《玉勝間》中之兩篇文章），引用之

¹⁵³ 「後世の人、萬葉は哥なり、哥はをみなのもてあそぶ戲の事ぞ、と思ひ誤れるまゝに、古哥をこゝろえす、古書をしらず、なまじひにから文を見て、こゝの神代の事をいはんとする、さかしら人多し。よりにてそのいふ事虚理にして、皇朝の古への道に吐へるは惣てなし。」賀茂真淵撰，井上豊校訂：《にひまなび》，《賀茂真淵》第十九卷（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80年），頁205。

¹⁵⁴ 「われももとより、神の御典をとかむと思ふ心ざしあるを、そはまづからごゝろを清くはなれて、古へのまことの意をたづねえずはあるべからず。」本居宣長撰，大野晉、大久保正校訂：〈あがたのうしの御さとし言〉，《玉勝間》，《本居宣長全集》第一卷，頁86。

¹⁵⁵ 笹月清美指出，本居宣長對「漢意」的言論亦包含了針對學者的研究立場、態度之批判。參閱笹月清美：《本居宣長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44年），頁66-67、72-73。

¹⁵⁶ 「古學とは、すべて後世の説にか、はず、何事も、古書によりて、その本を考へ、上代の事を、つまびらかに明らむる學問也。」本居宣長撰，大野晉、大久保正校訂：《宇比山踏》，《本居宣長全集》第一卷，頁15。

¹⁵⁷ 參閱笹月清美：《本居宣長の研究》，頁66。

後云：

研讀《萬葉集》，必詳味上文之意，常存於心而不可忘。¹⁵⁸

可見木村私淑賀茂、本居，贊同其消除「漢意」的研究理念。值得注意的，本居宣長對「漢意」的批判包含了強烈的日本文化優越論¹⁵⁹。木村的《萬葉集》研究成就主要在三《辯證》與《美夫君志》。據筆者查考，木村在其著作中幾乎沒有宣揚本居宣長那樣的優越論¹⁶⁰。木村應當只有贊同了做為研究理念的「漢意」批判而已。再者，木村也在其著作中批判學者的「後世意」¹⁶¹、「後世心」¹⁶²。

其實木村對《和名類聚抄》、《萬葉集》中俗字之研究可屬於國學之範疇。因為日本古書中的漢字也可被納為國學的研究範圍。本居宣長認為，學者應當要看中國書籍，因為日本古書用漢字、漢文，古代日本的政治制度多來自於中國¹⁶³。可以說，本居本來就沒有想要忽視古書中的漢字。再說，本居宣長也探討《古事記》中異體字：

「吳公」指蜈蚣（《延佳本》作「蜈蚣」，是淺人所改。諸本皆作「吳公」）。《字鏡》「蛆」字之下亦有「吳公」。如此省偏，是日本古代的寫法之一。如「健」寫為「建」（「建」字本無讀為「多氣[ta ke]」¹⁶⁴之義）。……《和名抄》：上野國鄉名有「委文（之土立[shi do ri]）」。此亦省「倭」字之偏。後世「條」寫為「条」，亦同例。¹⁶⁵

¹⁵⁸ 「この集を讀あきらめんとするともがらは、必上文の意をよくあちはひ、常に此を心にとめおきてわするべからざるなり。」木村正辭：〈本集につきての縣居鈴屋の兩大人の教へ言〉，《萬葉集美夫君志》，首卷，頁44。

¹⁵⁹ 關於本居宣長的文化優越論，參閱蔣春紅：《日本近世國學思想——以本居宣長研究為中心》（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年），頁251-266。

¹⁶⁰ 據查考，木村的著作只有一處對中國民族性進行批判，並以此讚揚日本國民性。但其部分不是木村自己的文章，而是引自賀茂真淵著作。參閱木村正辭：〈本集につきての縣居鈴屋の兩大人の教へ言〉，《萬葉集美夫君志》，首卷，頁41。

¹⁶¹ 同前註，卷1上，頁6。

¹⁶² 同前註，卷1下，頁48。

¹⁶³ 參閱本居宣長撰，大野晉、大久保正校訂：《宇比山踏》，《本居宣長全集》第一卷，頁16-17。

¹⁶⁴ 這讀音「タケ(ta ke)」有「健」之義。

¹⁶⁵ 「吳公は蜈蚣なり、（但し延佳本に、蜈蚣と作るは、さかしらに改めつるものなり、諸本みな吳公とあり）字鏡蛆字下にも「吳公」と作り、如此偏を省きて書クは、此方にて古の一書法なり、例をいはば、健を建と作、（建字に多氣と訓べき義はなし、）……和名抄上野國の郷名に委文、（之土利）とあるも、倭字の偏を省るなり、又後世に條を条とかくも此例なり。」本居宣長撰，大野晉、大久保正校訂：《古事記傳》，《本居宣長

本居認為古代日本有省略漢字偏旁的寫法，而且他對後世人改字有所批判。可以說，本居也關注古代人用字，後世人校勘。木村認為日本古書作者可能原來用俗字書寫，若修改俗字，則會損失古書原貌。其校勘態度與本居的異體字研究頗為類似。木村讚揚本居對「吳公」的校勘，云：「不失古書註釋之法也（古書の註釋の法を失はざるものなり）。」¹⁶⁶

通過上述的分析，木村正辭可說也算是國學系統學者。那麼，做為國學者的他如何看待清代考據學的「俗字需要訂正」這種俗字觀？據筆者查考，木村在其著作中沒有直接表明他對清代學者的俗字觀抱持何種意見，因而我們只能推測他的反應而已。據其研究理念來看，清代學者的「俗字需要訂正」的這種俗字觀應當不為國學者所容。首先，本居宣長提醒學者排除後世成見，或者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合理主義¹⁶⁷。再者，木村已經指出，古代日本人常用俗字。從國學的角度來說，若有日本人遵從清代考據學而主張「日本古書中的俗字需要訂正」，他應當被認為是根據後世理念，跟中國的價值觀、合理主義來判斷古代日本文化。要之，清代的俗字觀可能被認為是一種「後世意」、「漢意」，因而它不會為木村所採用¹⁶⁸。

六、結語

本論文以木村正辭《萬葉集文字辨證》為中心，來檢證清代考據學對《萬葉集》研究的影響情形。

《文字辨證》的學術特色主要在於以俗字研究為基礎的校勘。木村正辭之前《萬葉集》研究的大師，如賀茂真淵、本居宣長等幾乎沒有研究《萬葉集》傳本

全集》第九卷（東京：筑摩書房，1968年），頁449。

¹⁶⁶ 參閱木村正辭：〈妄りに文字を改めまじきこと〉，《萬葉集美夫君志》，首卷，頁32。

¹⁶⁷ 其實本居宣長所謂「漢意」與「後世意」在概念上有些重複。笹月清美指出，本居偶爾會批判後世學說中的「漢意」。參閱笹月清美：《本居宣長の研究》，頁76-77。

¹⁶⁸ 狩谷望之研究古書的理念也許與本居宣長有關。狩谷在《箋註》偶爾引用《古事記傳》，如：「本居氏曰：古總稱臟腑為『歧毛』。古名之遺者也。五臟六腑各有和名，非古。至鳥獸臟腑，今猶總稱『歧毛』。」參閱狩谷望之：〈肝〉，《箋注倭名類聚抄》（曙社版），卷2，頁170。本居宣長撰，大野晉、大久保正校訂：《古事記傳》，《本居宣長全集》第十二卷（東京：筑摩書房，1974年），頁99。再者，狩谷在寬政九年（1797）曾去訪問晚年的本居宣長。參閱梅谷文夫：《狩谷掖齋》，頁44-45。但是筆者還沒有發現狩谷的研究理念受到本居影響之具體證據。

中的俗字，因此，他們將俗字視為錯字，主張改字。木村證實《萬葉集》傳本中的中國古俗字之存在，主張俗字不需要修改，不能妄改字。

木村正辭的校勘原則、俗字研究其實受到了清代考據學之影響。木村在校勘上反對妄改字。顧炎武、阮元也主張不妄改字。木村認為自己的校勘原則與《校勘記》相同，且將《校勘記》當作《文字辨證》中校勘格式的榜樣。再者，他贊同顧炎武的校勘論。此外，木村在《文字辨證》中參考《段注》、《廣雅疏證》、《校勘記》等乾嘉考據學著作。這些著作與《文字辨證》在資料方面有些相同；以《玉篇》、《廣韻》等資料做為俗字資料，以《說文》為文字規範。木村認為過去《萬葉集》研究的缺點在於缺少文字學知識，此方面的學術在中國乾隆朝之後發達起來。

對於木村與清代考據學的關係，我們需要注意江戶時代末期的學者群體之存在。當時有一個以狩谷望之為學術領導的群體。木村正辭的老師岡本保孝也屬於這群體，木村其實是繼承其學統的學者。該群體在學術研究上積極地參考清代考據學的小學、校勘成就；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王念孫《廣雅疏證》、阮元主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等。做為狩谷望之的後學，岡本保孝之學生，木村也重視清代考據學成就，受到了如上考據學著作的影響。

要之，清代考據學經由狩谷望之、岡本保孝而影響到木村正辭的《萬葉集》研究（校勘原則以及俗字研究）。值得注意的，木村以俗字研究為基礎的校勘方式，影響了後世的《萬葉集》研究。現代《萬葉集》的校勘在校勘方面留意於保存異體字、俗字，並且對於改字相當慎重。可言清代考據學經由木村正辭而奠定了現代《萬葉集》校勘的部分基礎。

此外，本論文研究成果呈現：木村正辭與他所參考的清代考據學者在俗字觀方面的差異。乾嘉學者在其校勘工作上認為：俗字需要訂正。木村認為：古代日本人並不在意漢字字形的正俗，古書作者原來用俗字書寫，若修改俗字，則是屬於損失古書原貌的行為。筆者在論文中探討一個問題。木村正辭在學術方面雖然受到清代考據學的影響，卻沒有繼承「俗字需要訂正」的俗字觀。為何有所不同？這種差異可能來自於木村的研究理念根源：賀茂真淵、本居宣長的國學。國學對「漢意」、「後世意」的批判影響了木村的俗字觀。

清代考據學對日本古典文學研究 之影響研探

——以木村正辭《萬葉集文字辨證》為中心

金原泰介

據前人研究，清代考據學對日本近代漢學有不少影響。其實，其影響不一定限於漢學領域。木村正辭(1827-1913)是江戶、明治時代的日本古典文學專家。他以《萬葉集》研究而聞名，在學術史上佔重要地位。

本研究以木村正辭《萬葉集文字辨證》為中心，來考察木村的《萬葉集》研究與清代考據學之關係。本文的研究指出：木村在《萬葉集文字辨證》中證實《萬葉集》傳本中的中國古俗字之存在，主張俗字不需要修改，不能妄改字。如上述俗字研究、校勘原則，其實受到了清代考據學之影響。木村以俗字研究為基礎的校勘，影響了後世的《萬葉集》研究。現代《萬葉集》的校勘在校勘方面留意於保存異體字、俗字，並且對於改字相當慎重。可說是清代考據學經由木村正辭而奠定了現代《萬葉集》校勘的部分基礎。

此外，本文也指出：木村正辭與乾嘉學者在俗字觀方面另有差異。乾嘉學者在其校勘工作上認為：俗字需要訂正。木村受到狩谷望之(1775-1835)的影響而認為：古代日本人並不在意漢字字形的正俗，古書作者原來用俗字書寫，若修改俗字，則是屬於損失古書原貌的行為。這種差異可能來自於木村研究理念的根源——賀茂真淵(1697-1769)、本居宣長(1730-1801)的國學。國學對「漢意」、「後世意」的批判影響了木村的俗字觀。

關鍵詞：清代考據學 木村正辭 《萬葉集》

The Influence of Qing Dynasty Evidential Scholarship on the Philology of Classical Japanese Literature: A Study of Kimura Masakoto's *Man'yōshū moji benshō*

KIMBARA Taisuke

Kimura Masakoto (1827-1913) was a scholar of classical Japanese literature in the Meiji era. His studies of the *Man'yōshū* are still famous, and influential. The Japanese scholar Kojima Noriyuki has pointed out that Kimura's studies were influenced by Qing era "evidential scholarship". However, this question has not been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Focusing on Kimura's attention to variant, unorthodox character forms in the *Man'yōshū*, the present essay shows that Kimura was influenced by the practices of evidential scholarship. However, he was also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Japanese scholarship, where greater stress was placed o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se variant character forms.

Keywords: Qing dynasty evidential scholarship Kimura Masakoto *Man'yōshū*

徵引書目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王念孫：《廣雅疏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9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王筠：《重槩正字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24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王曉平：〈俗字通例研究在日本寫本考釋中的運用——以《萬葉集》漢詩文為例〉，《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頁45-51。
- 李占平：《段注俗字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0年。
-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汪紹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文史》第3輯，1963年10月，頁25-60。
- 阮元主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80-18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____撰，鄧經元點校：《學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周斌武：《漢語音韻學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
- 林慶彰：《中國經學研究的新視野》，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段玉裁撰，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
- 胡吉宣：《玉篇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郎文行：〈阮刻本《禮記注疏》底本改字初探〉，《文教資料》2013年第29期，頁51-53。
- 孫雍長、李建國：〈宋元明清時期的漢字規範〉，《學術研究》2006年第4期，頁135-141。
- 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 張玉書等：《御定康熙字典》，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9-23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張其昀：《《廣雅疏證》導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 張湧泉：《漢語俗字研究》，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
- 張舜徽：《廣校讎略》，《廣校讎略·漢書藝文志通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 畢沅：《經典文字辨證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23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____：《釋名疏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8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連清吉：《日本江戶時代的考證學家及其學問》，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
- 郭在貽：〈《說文段注》與漢文字學研究〉，《郭在貽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陸費墀：《四庫全書辨正通俗文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23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麥耘：《音韻學概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
-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
- 趙少咸著，余行達等整理：《廣韻疏證》，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
- 墨翟撰，畢沅校註：《墨子》，收入《新編叢書集成》第2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5年。

- 蔣春紅：《日本近世國學思想——以本居宣長研究為中心》，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年。
- 盧文弨：《羣書拾補》，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4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魏宇文：〈談畢沅《釋名疏證》中的「今本俗字」〉，《中國語文》2007年第1期，頁63-67。
- 顧炎武撰，徐德明校點：《金石文字記》，《顧炎武全集·建康古今記（外八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上野修：〈『萬葉集』における「荅」字考——木村正辭『萬葉集文字辨證』を中心に——〉，《日本文學論集》第27號，2003年3月，頁1-8。
- 久松潛一：〈明治の國文學者——小中村清矩と木村正辭——〉，《日本學士院紀要》第26卷第3號，1968年11月，頁133-142。
- 大沼宜規：〈木村正辭舊藏本の考證と復元——大東急記念文庫藏「櫛齋藏書目錄」をてがかりとして——（上）〉，《かがみ》第37號，2006年3月，頁1-52。
- _____：〈木村正辭舊藏本の考證と復元——大東急記念文庫藏「櫛齋藏書目錄」をてがかりとして——（下）〉，《かがみ》第38號，2008年3月，頁54-116。
- _____：〈木村正辭舊藏資料について——解説と目錄——（上）〉，《東洋文庫書報》第35號，2004年3月，頁23-112。
- _____：〈木村正辭舊藏資料について——解説と目錄——（中）〉，《東洋文庫書報》第36號，2005年3月，頁23-78。
- _____：〈木村正辭舊藏資料について——解説と目錄——（下）〉，《東洋文庫書報》第37號，2006年3月，頁27-82。
- _____：〈明治前期における歴史考證とその淵源——「經濟有用の系譜」——〉，《季刊日本思想史》第67號，東京：ぺりかん社，2005年12月，頁28-49。
- _____：〈舊藏書の識語にみる木村正辭——書物をめぐる活動記録稿——〉，《東洋文庫書報》第40號，2009年3月，頁15-46。
- 大久保正：《本居宣長の萬葉學》，收入《宣長·鈴屋關係資料集·研究篇四》，東京：クレス出版，2012年。
- 小島憲之：《上代日本文學と中國文學——出典論を中心とする比較文學的考察——》中卷，東京：塙書房，1964年。
- _____、木下正俊、東野治之：《萬葉集》第1冊，收入《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東京：小學館，2003年。
- 山田孝雄：《萬葉集と日本文藝》，東京：中央公論社，1956年。
- 川瀨一馬：《日本書誌學之研究》，東京：講談社，1971年。
- 中山久四郎：〈考證學概説〉，收入福島甲子三編：《近世日本の儒學》，東京：岩波書店，1939年。
- 中根肅治：《慶長以來諸家著述目錄》，東京：八尾書店，1894年。
- 井上光貞等校注：《律令》，東京：岩波書店，1976年。

- 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日本隨筆大成》新裝版，第2期21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年。
- 木村正辭：《萬葉集書目提要》，東京：大八洲學會，1888年。
- _____：《萬葉集書目》，東京：大八洲學會，1889年。
- _____：〈古書を訂正する方法を論ず〉，《東京學士會院雜誌》第15編之1，1893年1月，頁25-38。
- _____：〈音韻學の要領〉，《東京學士會院雜誌》第18編之4，1896年4月，頁166-189。
- _____：〈日本古代字書の説〉，《東京學士會院雜誌》第19編之10，1897年11月，頁408-432。
- _____：〈萬葉集古義存疑〉，《國學院雜誌》第6卷第5號，1900年5月，頁1-10。
- _____：《萬葉集文字辨證》，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4年。
- _____：《萬葉集字音辨證》，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4年。
- _____：《萬葉集訓義辨證》，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4年。
- _____：《萬葉集總釋》，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5年。
- _____：《櫛齋雜攷》，東京：光風館書店，1909年。
- _____：《萬葉集美夫君志》，東京：上原書店、光風館，1901-1911年。
- _____：《櫛齋集》，木村正辭個人出版，1911年。
- 水上雅晴：〈顧廣圻與《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以《毛詩釋文校勘記》爲考察中心〉，收入劉玉才、水上雅晴主編《經典與校勘論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 平田昌司：〈科擧制度と中國語史〉，《古典學の再構築》第7號，2000年7月，頁54-60，網址：<http://www.classics.jp/RCS/NL07/NL07Hira.pdf>。檢索日期：2016年9月1日。
- 本居宣長撰，大野晉、大久保正校訂：《古事記傳》，《本居宣長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68-1974年。
- _____：《玉勝間》，《本居宣長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68年。
- _____：《宇比山踏》，《本居宣長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68年。
- _____：《萬葉集玉の小琴》，《本居宣長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
- 石塚晴通：〈漢字字體の日本的標準〉，收入石塚晴通主編：《漢字字體史研究》，東京：勉誠出版，2012年。
- 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卷，東京：筑摩書房，1997年。
- 安田元久：〈中世・時代の範圍〉，收入《國史大辭典》第9卷，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年。
- 竹添進一郎：《左氏會箋》，東京：明治講學會，1904年。
- 西宮一民編：《古事記》修訂版，東京：株式會社おうふう，2012年。
- 佐竹昭廣：〈萬葉をよむころばへ〉，《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月報）》第90號，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頁15。

- 佐佐木信綱：《文と筆》，東京：廣文堂書店，1915年。
- _____：〈萬葉學先哲の苦心に就いて〉，收入《教學叢書》第2輯，東京：教學局，1938年。
- _____等主編：《校本萬葉集》新增補版，東京：岩波書店，1994年。
- 杉本つとむ：〈『字學舉隅』解説〉，收入《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別卷1，東京：雄山閣，1995年。
- _____：〈『和名類聚抄箋註 異體字辨』解説〉，收入《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第10卷，東京：雄山閣，1995年。
- 村岡典嗣：《增訂日本思想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
- 町田三郎：《明治の漢學者たち》，東京：研文出版，1998年。
- 岡本保孝：《論癡符》，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鈔本。
- _____：《古今文字》，收入《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第8卷，東京：雄山閣，1995年。
- 松崎復：《嫌堂日歷》，收入《日本藝林叢書》第11冊，東京：鳳出版，1972年。
- 河野頼人：〈木村正辭の萬葉集研究——國立國會圖書館藏「萬葉集會讀記」の紹介〉，《北九州大學文學部紀要》開學30年記念號，1977年3月，頁47-110。
- 長澤規矩也：《長澤規矩也著作集》，東京：汲古書店，1983年。
- 契沖撰，築島裕等校訂：《萬葉代匠記》，《契沖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73-1975年。
- 昭和女子大學近代文學研究室：《近代文學研究叢書》第13卷，東京：昭和女子大學光葉會，1959年。
- 狩谷望之撰，山田孝雄、香取秀眞校訂：《古京遺文》，《狩谷椽齋全集》，東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28年。
- 狩谷望之：《和名類聚抄箋註・異體字辨》，收入《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第10卷，東京：雄山閣，1995年。
- _____：《校本日本靈異記》，《狩谷椽齋全集》，東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25年。
- _____：《箋注倭名類聚抄》，東京：印刷局，1883年。
- _____：《箋注倭名類聚抄》，東京：曙社，1931年。
- 重野安繹：《成齋文二集》，東京：富山房，1911年。
- 神田喜一郎：《神田喜一郎全集》，京都：同朋舍，1987年。
- 梅谷文夫：《狩谷椽齋》，東京：吉川弘文館，1994年。
- 清原夏野等主編：《令義解》，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普及版，東京：吉川弘文館，1994年。
- 笹月清美：《本居宣長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44年。
- 賀茂眞淵撰，井上豐校訂：《にひまなび》，《賀茂眞淵全集》，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80年。
- _____：《萬葉考》，《賀茂眞淵全集》，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77-1985年。
- 黃虎癡撰，龍啓瑞增輯，張仲眉校：《字學舉隅》，收入《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別

卷1，東京：雄山閣，1995年。

- 鈴木一男：〈上代人の正字意識について〉，《國語と國文學》，1968年11月號，頁1-13。
《萬葉和歌集》，安田十兵衛刊行，寬永二十年(1643)，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 榎一雄：〈岡本保孝のこと(上)〉，《東洋文庫書報》第8號，1977年3月，頁26-62。
_____：〈岡本保孝のこと(下)〉，《東洋文庫書報》第9號，1978年3月，頁1-49。
_____：〈「岡本保孝のこと」補遺〉，《東洋文庫書報》第10號，1979年3月，頁65-74。
- 鴻巢隼雄：〈鹿持雅澄の萬葉集古義と木村正辭、近藤芳樹の萬葉學〉，收入《萬葉集大成》第2卷(文獻篇)，東京：平凡社，1953年。
- 藏中進：〈『箋注倭名類聚抄』と清朝學術(その一)——『康熙字典』『佩文韻府』『駢字類編』をめぐって——〉，《東洋研究》第153號，2004年11月，頁1-25。
_____：〈『箋注倭名類聚抄』と清朝學術(その二)——王念孫『廣雅疏證』をめぐって——〉，《東洋研究》第157號，2005年11月，頁1-34。
_____：〈『箋注倭名類聚抄』と清朝學術(その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をめぐって——〉，《東洋研究》第161號，2006年11月，頁81-110。
_____：〈『箋注倭名類聚抄』と清朝學術(その四)——畢沅『釋名疏證』をめぐって——〉，《東洋研究》第165號，2007年11月，頁59-87。
- 藤山和子：〈江戸後期の考證學者と段玉裁の『說文解字注』〉，《大妻比較文化：大妻女子大學比較文化學部紀要》4，2003年3月，頁115-99。
- 鶴久、森山隆編：《萬葉集》，東京：株式會社おうふう，2012年。